

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第 174 期目錄

2019 年 12 月出刊

- 1 第 174 期給讀者的話..... 編輯部 1
- 2 班級學生人數較少並不會帶來較佳的閱讀能力.....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2
- 3 瑞典教育部長談學前教育數位素養.....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3
- 4 俄羅斯將建 100 個兒童科學中心，教授專業知識....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 5
- 5 英國中小學教師呼籲政府重視口語課程（oracy）....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6
- 6 英國政府最新研究報告顯示過去三年努力減少教師工時的措施已見成效
.....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9
- 7 美國大學致力協助畢業生創業.....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12
- 8 更多大學改變策略，招生不看 SAT，兩所常春藤學校也不看 GRE
.....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13
- 9 無協議脫歐對英國高等教育計畫實施的影響.....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15
- 10 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從起初的 700 名學生到目前超過 5 萬名
.....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18
- 11 波蘭與德國合設科學卓越中心.....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19
- 12 越南核醫學與世界接軌.....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21
- 13 德國已成為非英語系國家留學國首選.....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23
- 14 澳洲教育部要求提高國際學生入學英語能力檢定的透明度
.....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25
- 15 面對時代變遷，學者批評法國技職教育改革裹足不前
.....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26

16	德國政經界與工會聯署「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 2019-2021」強化雙軌式教育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28
17	加國校園設立投票所維持年輕人投票率增長趨勢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31
18	德國政治文化轉變，學術自由堪憂.....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33
19	英國教育標準局新學年度教育視導項目，納入文化資本引發討論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35
20	想改變課程陣容嗎？首先應分析整體課程設計.....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39
21	軟硬體量身打造，法國中學送身心障礙生走向康莊大道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41
22	學童濫用電子產品，法國學者警告恐致學力下降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43
23	以前瞻群聚網絡迎接德國的未來.....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45
24	美國全國學校董事協會與產業合作，確定六項生涯準備技能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48
25	學校營養午餐效果，日本兒童過重比例為先進國最低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50
26	陪審團判定愛荷華州立大學對學生的自殺負有部分責任，這對其他大學有何 啟發？.....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51
27	聯邦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率急遽升高.....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54
28	當學校變成跨性別學生的戰場，老師要學習保護他們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56
29	英國政府平等辦公室公布性別平等路徑圖，以保障女性權益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60
30	瑞典教育部長談大學推動性別主流化重要性.....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63

31 招生歧視案哈佛勝訴 常春藤盟校讚：重申多元化益處
.....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66

32 加國媒體素養週推廣事實查證，並遏止假信息的傳播
.....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68

給讀者的話

編輯部

本期收錄來自加拿大、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奧地利、瑞典、波蘭、日本、越南、澳大利亞等 12 個國家的教育訊息計 31 則，內容呈現各國教育重要趨勢與發展，值得各界研究參考。

近年來，德國積極推動「雙軌式教育」，讓學生一方面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一面在企業獲取實務經驗及最新職業技能，以更紮實培訓企業需要的專業人才。在《德國政經界與工會聯署「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 2019-2021」強化雙軌式教育》一文得知德國政府與企業簽屬「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宣言，對活動領域及具體措施進行重新定位並持續致力於強化技職教育的吸引力、品質、功效與產能之發展。技職教育不僅是德國經濟界競爭力與創造力之保證，同時對於社會中不同族群的整合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各邦政府將扮演「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之可靠與強大夥伴的角色，以提高技職教育體系的吸引力和生產力，值得各界參考。

學術課程是高等教育的命脈，不僅對學校有價值，更是對學子有長遠影響力。在《想改變課程陣容嗎？首先應分析整體課程設計》一文中，提及課程內容常隨時間推移而變更，以致無全盤徹底檢視，使定期重新評估學術陣容變得至關重要。近期《高等教育紀事報》發布《學術課程的正確組合：做出決定以新增、削減、擴張或縮減院系和學位》之報告，討論如何關閉、調整、擴展課程，以及優化課程安排。另根據其使命（學校的專長）、市場（學生想要的方向）、和利潤（課程要能產生收入以支持使命）三方面進行評估：仔細檢視課程帶來的學生收益、衡量課程的效率和產能及著重行政管理，期透過學術上及行政上的檢視，以提高校方運作的透明度及問責度，有助於建立大學的永續發展模型以實現其教育使命及確保學生成就，值得進一步閱讀。

本院原於每月 15 日發行《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定期將各國教育訊息擇要寄送予教師、學者專家與教育行政人員等；惟考量能更即時且系統性地提供國際教育趨勢與議題資料，茲於「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TERIC)」(網址：<https://teric.naer.edu.tw>)提供讀者可依國家、類別、各駐外單位、關鍵字等方式進行查詢；至原有《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於本期(第 174 期)發刊之後即予停刊，該電子報網站營運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感謝讀者們長久以來對本電子報的支持與愛護，國家教育研究院未來仍將秉持創新研究與發展的原則，繼續為教育界提供更好服務。

班級學生人數較少並不會帶來較佳的閱讀能力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一項新的研究表示，只有本國兒童才能從免費的義務學前班(也就是幼兒園最後一年)受益。一項聯邦教育研究機構的研究顯示，在維也納，雖然每班學生人數從 2007 年秋季開始減少，但是小學生並沒因此而提高了閱讀能力。反過來，從免費的義務學前班獲益的是本國兒童，而不是移民兒童。

為了進行調查，研究人員對第一代(非奧地利出生的兒童)和第二代移民(在奧地利出生的兒童，父母都在國外出生)的子女進行了區分，主要是因為第一代的移民情況有可能學童沒有上過義務學前班。另外，由於具有相同的語言背景，德國父母的兒童被歸為本國兒童。

結果顯示與當初政策目的相反的情形，降低班級學生人數並沒有帶來更好的成績。實際上，2011年的成績甚至比2006年還差，無論是無移民背景兒童或第二代移民兒童。

自2008年以來的語言輔導政策、2009年的全國教育計畫和義務學前班，以及2010年以來的教育水準首次予以評量。研究人員沒有預計到的是，已經從改革措施中受益的本國兒童的閱讀能力比前一代高，但是在具移民背景的兒童卻沒有明顯的變化。

令人驚訝的是，將本國兒童跟具移民背景的兒童相比，本國兒童就讀幼兒園的比率有所提高。研究人員預期的是，具移民背景的兒童在義務幼兒園和早期語言輔導中受益更多，但結果卻是本國兒童受益。此外，本國兒童就讀幼兒園的平均時間比具移民背景的兒童更長，同時研究顯示，只有長期就讀高品質的幼兒園才有長期正面的影響。

譯稿人：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來源：2019年10月8日，奧地利新聞報，Studie: Weniger Schüler pro Klasse führen nicht zu besserer Leseleistung

<https://www.derstandard.at/story/2000109623408/weniger-schueler-pro-klasse-fuehren-nicht-zu-besserer-leseleistung>

瑞典教育部長談學前教育數位素養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瑞典教育部長 Ms. Anna Ekström 日前發表一篇有關瑞典幼兒園教育的辯論文章。

幼兒園是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的機構。研究指出幼兒園有助於發展兒童學習、語言發展和社交技能。上過優質幼兒園的兒童比未上幼兒園的兒童更能為進入小學做好準備，並且學到更多。因此，幼兒園對學生未來的學業成績至關重要。

幼兒園兒童的數位素養培養

為提高幼兒園教育質量及平等，瑞典政府根據學校署與研究人員、專家及教保人員共同擬定的建議，更新幼兒園課綱。在新課綱裡明確闡述兒童健康與全面發展的重要性、遊戲對兒童發展及學習的意義，以及兒童透過聆聽大聲朗讀來發展語言學習的重要性。修定版的課程大綱也同時明定幼兒園培養兒童數位素養的工作。

這並不意味學齡前的兒童應該花更多時間坐在螢幕前，或把平板及電腦當作托兒工具。兒童在幼兒園期間應該到處走走、探索世界、玩耍，以及練習社交技能。他們應該動手操作、組合建造、繪畫以及聽故事。隨著年齡的增加，也要提供能讓他們了解以及使用的數位工具機會來刺激他們的發展及學習。

將被動改為主動

絕大多數兒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數位工具，但通常是用其他人所生產的產品來被動消費。但在幼兒園裡，兒童就有機會在對數位技術相對嚴謹及負責的方式下讓兒童變成主動積極的使用者。例如利用相機、機器人、數位電子雞蛋，以及動畫軟體等讓兒童自己動手做影片、創作故事或用新方法去探索周遭環境。這是教保人員的責任。他們應確保自始至終有意識地使用數位或其他教材工具來協助兒童發展及學習。

當然，年紀較小的幼兒應當將更多時間花在玩耍、待在大自然裡、

動手操作、組合建造、繪書、聽故事，以及學習社交互動上。因此，政府的幼兒園教學課程大綱為最幼小的幼兒發展和教育奠定最好的基礎。

撰稿人/譯稿人：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鍾菊芳

資料來源：Swede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9, 10,9). “Digitala verktyg i förskolan ska inte användas som barnpassning.”

<https://www.regeringen.se/debattartiklar/2019/10/digitala-verktyg-i-forskolan-ska-a-inte-anvandas-som-barnpassning/>



俄羅斯將建 100 個兒童科學中心，教授專業知識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

俄羅斯聯邦新形式教育發展基金會(the Federal Fund for New Form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宣布，2024 年以前所有聯邦大學將設立兒童科學中心，依據國家需要的人才教授學童現代專業知識，項目包括:資訊技術、工程(engineering)、醫學、教育，此係國家計畫“教育”的一部分。

第一個兒童科學中心 3 月 22 日已在康德波羅的海聯邦大學正式啟用，2024 年前將在其他聯邦大學設立兒童科學中心，預計在國家計畫“教育”結束前在全國各州至少會設立 100 個類似的機構。今年計畫再啟用 12 個。

此項計畫的資金來自聯邦預算及合作夥伴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資，資金主要用在添購設備及建立共用工作空間(Coworking)。各大學的實驗室將為執行此計畫的地點。建立一個兒童科學中心需要 1,200 萬至 1,500 萬盧布；耗材的預算為 50 萬至 150 萬盧布。

兒童科學中心的目標在最近未來五年創建一個新的教育創新環境，幫助學童-未來的專家掌握符合當前經濟挑戰所必要的技巧及能力，這些軟實力包括計畫思考及計畫管理。學童們能夠掌握愈多此類的解決方案，就愈能獲得專業技能。

除了兒童科學中心外，在國家計畫“教育”內亦持續建立其他兒童科學組織。例如計畫建 1 萬 6,000 個'成長點(Growth Point)'教育中心；在 3 萬所中學添購設備建立數位教育環境；在每個州設立資賦優異兒童中心(共 85 個)；建 245 個兒童技術園區'Quantorium Technology Park'，另建 345 個行動式 Quantorium Technology Park。

國家計畫“教育”的執行時間為 2019 年至 2024 年。該計畫的總預算達 7,845 億盧布，目的在確保俄羅斯教育的全球競爭力，並進入全球國民教育品質國家排名的前十名。

資料來源：2019 年 10 月 4 日，塔斯新聞社

<https://tass.ru/nacionalnye-proekty/6962804>

英國中小學教師呼籲政府重視口語課程（oracy）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今年年中，一間位於約克郡西部地區的小學，Copthorne Primary School，要求學生講話時停止放入停頓詞。該校校長 Christabel Shepherd 先生表示，這個新措施的目的係鼓勵學生豐富發言的詞彙、加強使用文字的能力，使學生可以清楚明瞭地表達意見，而非在語句間塞入無關緊要的語詞，或甚至使用重複詞語充數。Shepherd 校長認為，現在的學生正處於一個強調快速，連說話都不肯浪費一分一秒的時代，導致學生往往發言時，只能透過大量的停頓詞和語詞重複塞滿整句話，表示其「仍在發言」或「有在發言」，但是，有發言不等同於好的發言。因此，他們想傳達給學生的訊息是，在發表或回覆意見時，先暫停好好思考發言內容是重要且必要的。

Copthorne 小學對於學生發言的新政策，正好呼應這幾年英國民間與中小學教師呼籲政府重視的口語課程（oracy）。

口語能力（Oracy）這詞最早是在 60 年代由英國研究人員與教育家 Andrew Wilkins 創造，希望凸顯口語能力和識字（literacy）、數字運算能力（numeracy）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口語能力在教育領域是指學習口說的能力以及透過口說強化學習。對於中小學生的學習而言，口語能力的培養是讓學生不但可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樂於和同儕分享看法，也更有自信地透過對話過程挑戰他人的觀點。

對於口語能力是否要納入中小學教育課程之中，有部分意見認為在數位時代下，寫作與識字能力將是現代人必備的職場技能，口語能力則退而其次。然而，口語課程面臨更重要的問題係實踐上困難。困難點在於如何向學生傳遞正確的口語學習目的、使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生口語能力，避免使課堂學生間流於隨意交談，反而阻礙課程進行。

一間位於東倫敦，招收 4 歲至 18 歲學童的自由學校—School 21（註 1），自從 2012 年創校以來，一直致力於提倡口語課程。該校推廣口語課程的努力也獲得英國教育資助基金（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的支持，實施一項「Voice 21 前導計畫」。

根據 School 21 老師多年的教學經驗，他們分享口語課程除了要先確定課程的教學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涵蓋四大教學面向：肢

體、語言、認知、社會與情感。口語交談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行為，肢體面試強調發言者的姿勢、肢體動作等也是溝通過程重要的表達要素。語言是關於詞彙選擇和詞彙學習。認知方面則著重在發言的組織架構與內容。最後，社會與情感面向則是要培養同理心和合作態度。在教學過程中，School 21 的教師也強調要不斷和學生傳達傾聽的重要，不僅發言的意見必須有事實或證據的支持，也必須好好傾聽對方的發言。唯有好好的傾聽，才能知道自己的發言是要支持他人看法並且延伸論點，或是要提出事實來反駁他人意見。

「Voice 21 前導計畫」最後的評量結果顯示，參與計畫學生的口說能力均有顯著的進步。然而，因為該計畫欠缺對照組，且評量方法欠缺一致性和量化結果，導致該計畫的教學內容無法發展出可適用於所有學校的系統性教材。

事實上，英國中學會考科目的調整以及英國資歷及考試標準局（The 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 Examinations Regulation, Ofqual）的政策，也反映出教育當局未重視口語能力的現狀。首先，英國政府於2013年將演說與聽寫測驗（speaking and listening assessments）從中學會考（GCSE）的英文科目中移除。在此之前，演說測驗占了中學會考英文成績的20%。2013年對於GCSE測驗科目的調整，導致演說與聽寫技巧的測驗成為非強制性的單獨能力測驗，評分採5分制。由於演說與聽寫技巧並非統一課綱（national curriculum）的必修項目，許多學校老師寧願將英文的教學時間分配到考試項目上，而不重視演說與聽寫技巧的訓練。

其次，執掌英國國內各項資歷檢測與考試的英國資歷及考試標準局，其首席檢察官 Glenys Stacy 女士表示，若要將演說以及聽寫技巧的測驗納入中學會考的英文科目之中，必須要有一套可適用於所有學校的評量方法。然而，考試委員會目前所收到的研究資料與證據，尚未顯示出有統一性評量標準的存在。評量方法若缺乏一致性，將可能產生不公平結果，而不公平結果正是英國資歷及考試標準局所要避免的。因此，在英國中小學統一課綱尚未調整之前，演說與聽寫技巧的測驗依然繼續維持現行方式。

儘管英國教育政策尚未正面回應中小學教師的訴求，英國前任教育部長 Damian Hinds 先生也正推動將學生課堂行為列為品格教育的五大指標之一，英國的學校事務大臣 Nick Gibb 在回應 Copthorne 小學新政策的新聞，卻公開支持口語能力應當是中小學學生重要的能力

之一。因此，或可期待英國政府未來將會對口語課程的推廣提出相應的舉措。

註1：自由學校（free school）係英國2010年的聯合政府，為鬆綁公辦民營學校（Academies）的型態與賦予更多自主性，推動由政府出資，但由教師、家長團體、慈善團體及企業籌設的新型態學校。

資料來源：

2019年7月19日，TES News, 'A focus on oracy can transform your school'

<https://www.tes.com/magazine/article/focus-oracy-can-transform-your-school>。

2019年6月17日，BBC News, 'Bradford primary school curbing pupils' overuse of 'like'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leeds-48662463>。

2017年4月13日，TES News, 'Oracy is an underdeveloped skill in the UK — here's how to help your primary class speak up'

<https://www.tes.com/news/oracy-underdeveloped-skill-uk-heres-how-help-your-primary-class-speak>。

BBC News, 'Speaking Up For Oracy'

<https://sites.google.com/a/wilmslowhigh.com/bbc-school-report-2017/bbc-news-school-report-2016/6-oracy>。

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 'Voice 21: Improving Oracy (re-grant)'

<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projects-and-evaluation/projects/voice-21/>。

Voice 21, 'New inquiry -Speak for change'

<https://www.oracyappg.org.uk/>。

英國政府最新研究報告顯示過去 三年努力減少教師工時的措施已見成效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英國教育部在今（2019）年十月發佈 2019 年「教師工作負荷調查」(Teacher Workload Survey) 報告，研究結果指出，教師的每週工時，較 2016 年調查減少將近 5 個小時，來到每週約 49.5 小時工時；校長及校園高階主管的工時則大幅降低，來到每週 55.1 個小時。英國教育部認為，這樣的成果可以歸功於過去幾年推動減少教師執行與教學無關事務的措施奏效（註 1）。

這項研究報告除了指出教師每週工時較 2016 年調查時減少之外，尚有以下研究發現：教學時數，與 2016 年調查相比，並無太大的變化。

花在非教學活動的時數，根據小學教師、中學教師，以及中階主管們的填答資料，他們花在備課、評分以及個別指導學生的時數，也較 2016 年微幅下降。但老師們反應，他們還是覺得耗費許多時間在資料整理和一般性的行政事務上面。教學階段和職務的不同，也會影響工作內容的時數分配，例如小學老師和中階主管們會花許多時間在與家長溝通；中學教師和中階主管們的時間，則比較多是在管教學生方面。

在對工作負荷的感覺上，相較小學老師、中階和高階主管的反應，中學老師們覺得工作負擔相當沈重。然而不分背景，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無法在契約規定的每週工時內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們認為現在的工作負擔太重，也讓他們無法在工作和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就校園工作環境而言，高階主管們表示，他們很努力在法令規定的範圍內，避免讓教師執行與教學無關的事務，也鼓勵老師們可以合作規劃教學工作，但在校園內，並沒有任何可以監控教師工作負荷的機制。雖然老師們表示，他們可以感受學校對專業發展的支持，但是看來目前並沒有任何積極降低工作負擔的作為，極少數的教師認為，現行的措施可以降低教師的工作負擔。

教育部長 Gavin Williamson 表示，雖然這項研究結果顯示，政府諸多降低教師每週工時的措施已展現初步效果，他不會以此自滿，因

為報告結果也反映了，政府仍有諸多可以著力、改善的地方。教育部希望透過教導教師使用新科技，以協助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備課，讓教師更有效率地利用工時，有更多的時間教導學生。

即便教育部對此項研究結果表示樂觀，也宣示會將更多資源投入以求降低教師每週工時，在此項研究中，仍然可以看到令人擔憂的地方。例如將近七成的國小教師，以及九成的中學教師表示，教師的工作負擔是一項「相當嚴重」或「非常嚴重」的議題。而早在今年四月，一份來自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CL IOE）一份研究報告便指出，教育工作的挑戰性與多變性，讓許多教師不堪負荷而辭職。在踏入教育職場之前，這些教師以為他們了解教育工作的樣貌，也相信他們能夠克服教育職場的各項挑戰，然而，現實與想像之間巨大且無法跨越的鴻溝，最終導致他們走向辭職。這項研究報告指出，許多教師滿懷熱血，希望能對他們的學生產生正向的影響，但許多教學以外的事務，如管教學生的行為問題等因素，卻不斷侵蝕著他們的熱情。過多的工作壓力及負擔，讓老師們在工作及生活之間失去了平衡。在這份研究報告中，大約 1,200 名 UCL IOE 的校友們接受調查，有 40% 到 50% 的受訪者已經離開教職，或預計十年之內一定會離開教職。調查資料顯示，一些極端的數據中，有的老師一天的工時甚至長達 11 個小時，或是每週工時高達 60 到 70 的小時。從這份報告的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讓教師決定辭職的因素，不單單只是工作負荷量的問題，也包含了高壓的職場環境、教育工作本質的複雜性，以及許多績效管制措施剝奪了教師的教學創意，也限制了願意投入教育職場人才的多樣性。若無考慮教學文化的沈痾以及諸多管制績效考核措施，單單降低工作負荷量，可能無法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同樣來自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的 John Jerrim 教授則批評教育部的這些教師工作負荷調查，受試者填答率過低，同時投入此項調查的經費過低，在有限的預算之下所進行的研究，也讓人對此研究所產出的結果感到懷疑。他主張在教育部進行調查時，應該檢視教師的教學日誌，以釐清教師在他們的工時內發生了哪些事情，才能夠找出讓教師們感覺無法負荷的因素，進而對症下藥，真正減輕工作負擔。他也質疑參與這項研究樣本的代表性，Jerrim 教授以 2016 年的教師工作負荷調查為例，一開始抽取出預計要參與研究的 900 間學校裡

面，只有 245 間學校參與；這 245 間學校內共 10,410 位教師，最終完成調查的只有 3,186 位。再細緻地分析，可以發現扣掉加乘的比率後，整體填答率只有 8%，也就是說，每 12 名預計要參加調查的老師，最終只有 1 位完成調查。Jerrim 教授憂心忡忡地表示，不管以何種方式進行工作負荷調查，教師的工時過長已是不爭的事實。英國教育部對此則表示，政府將持續致力於減少教師不必要的工作內容，以降低教師工作負擔，同時也計畫在 2022-2023 年，提高初任教師的薪水至年薪三萬英鎊，希望藉此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投入教職。

註 1：關於 2019 年「教師工作負荷調查」詳細報告內容，可參閱英國政府教育部網站：<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eacher-workload-survey-2019>

資料來源：

BBC, 18 Sep 2019, Teachers 'have worked long hours for many years'

<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49728831>

Gov, 11 Oct 2019, Teacher workload cut by five hours a week over past three yea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eacher-workload-cut-by-five-hours-a-week-over-past-three-years>

Gov, 11 Oct 2019, Teacher workload survey 2019: research brie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38433/Teacher_workload_survey_2019_brief.pdf

TES, 02 Apr 2019, Teachers quit because they find workload 'worse than expected'

<https://www.tes.com/news/teachers-quit-because-they-find-workload-worse-expected>

TES, 19 Sep 2019, DfE teacher workload survey 'not fit for purpose'

<https://www.tes.com/news/dfe-teacher-workload-survey-not-fit-purpose>

TES, 11 Oct 2019, At least 70% of teachers working over contracted hours

<https://www.tes.com/news/least-70-teachers-working-over-contracted-hours>

美國大學致力協助畢業生創業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大學畢業生常因對現實社會缺少經驗與準備而在畢業當下不知所從。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GWU)成立了學生創業專案(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幫助有志創業的學生在步入社會之前得到實際的資助。

學校設有創業俱樂部 (Startups Club)為有興趣從事創業活動但難以邁出第一步的學生提供創業結構和鼓勵。在小型團隊中工作，以集思廣益，進行市場研究，制定商業計畫，開發原型，尋找專業導師，努力尋求財務和相關的支援，並從零開始瞭解建立產品或公司。

兩年前，Carleigh Berryman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GWU) 二年級時因自己年邁的祖母困境，開始瞭解療養院中老年人的焦慮和抑鬱率很高，而萌生了設計製造虛擬實境護目鏡的創業念頭。在大四那年參加了"新創業競賽" (New Venture Competition) 獲得了 5000 美元的種子資金 (seed money)，因此創造了 Viva Vita 公司。

Carleigh Berryman 用所獲得的 5000 美元及自己少許的積蓄，設計了 360 度旅行視頻虛擬實境的護目鏡並由耳機內播放內容。讓行動不便無法遠遊的老人輕鬆體會環遊名勝古蹟身歷其境的樂趣。Berryman 說，通過預訂在約 10 個退休社區，幾個月裡賺了數千美元。

GWU 的學生創業專案主管 Lex McCusker 說，自 2009 年以來，該校已經向約 2000 名學生企業家提供了超過 230 萬美元的現金獎勵和實物捐助。

譯稿人：蘇惠惠

資料來源：2019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education/a-recent-college-graduate-helps-nursing-home-residents-see-the-world--without-leaving-home/2019/10/14/31e3bcbe-eb89-11e9-9c6d-436a0df4f31d_story.html

更多大學改變策略，招生不看 SAT ，兩所常春藤學校也不看 GRE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擔心 SAT 或 ACT 測驗成績不佳的學子，可能可以鬆一口氣了。愈來愈多大學改變招生策略，錄取新生不必非有 SAT 或 ACT 測驗不可；布朗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兩所常春藤聯盟學校也決定，研究所課程申請者無須提供 GRE 測驗成績。

趨勢顯示，高等教育機構愈來愈不想使用高風險考試來錄取大學新鮮人，加州大學九個校區也在研究是否需要考試成績或用什麼考試來招生。

研究持續顯示，ACT 和 SAT 成績與家庭收入、母親教育水平和種族之間密切相關；儘管管理 SAT 和 ACT 的「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和 ACT Inc.都強調他們的測試可預測學生入學成功表現，但也有研究證實並非如此。

非營利組織「國家公平開放測試中心」(Fairtest)分析 2019 年高中畢業生 SAT 成績報告指出，不同人口群體之間的差距比去年同期擴大；歷來權利被剝奪的學生群體，平均 SAT 成績遠遠落後特權家庭學生。

反對濫用標準化考試的 FairTest 公共教育主管薛佛(Robert A. Schaeffer)表示，過去一年來，決定終止以 SAT/ACT 考試成績作為入學要求的學校數量激增；2018 年 9 月到 2019 年 9 月，有近 50 所認證大專院校宣布取消 SAT 或 ACT 入學要求。已做出此項決定的認證學校數量已達 1050 家，占總數 40%。

FairTest 說，雖然它們有些是宗教、音樂或藝術或護理學校，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前 100 所文科學院有一半以上入列，其中包括馬里蘭州、賓州、維吉尼亞州、華府和新英格蘭區六個州的大多數大學院校。

取消 SAT/ACT 測驗入學要求的學校表示，他們因此成功吸引更多類別的大學新生。芝加哥大學指出，去年做出此決定後，他們的第一代學生、低收入、農村及退伍軍人學生增加 20%。

威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早自 2009 年即毋須提供考試成績，從那年到 2017 年秋季，該校多元族裔學生增加 90%，其在

校學業成績表現與他人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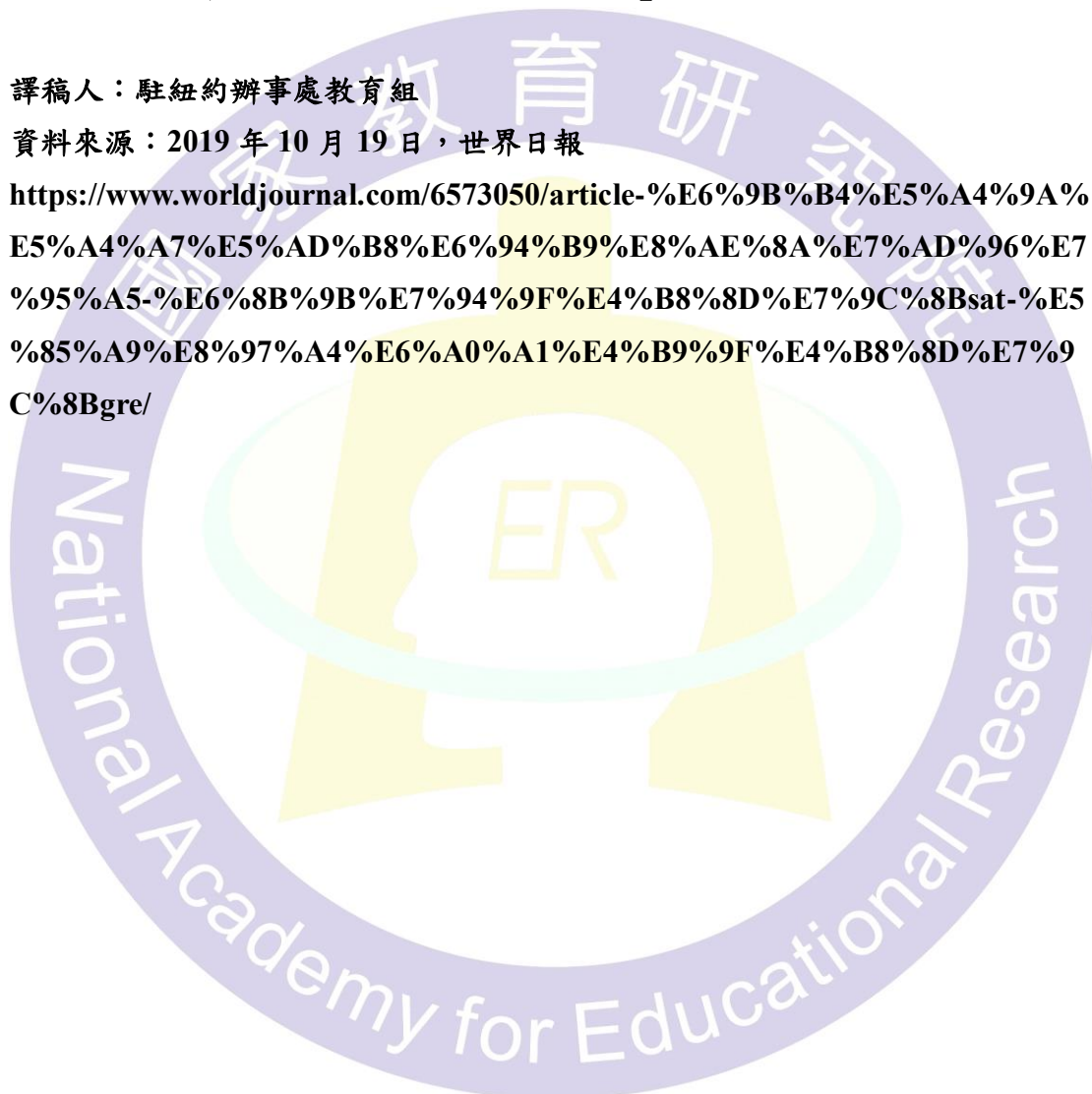
不過，大學理事會、ACT 和管理 GRE 的「教育測試服務中心」(ETS)面對這樣的潮流趨勢，都期期以為不可。ETS 聲明指出，放棄 GRE 分數要求是個錯誤。

ACT 表示，「ACT 分數是唯一可以提供通用標準化指標的錄取決定因素。」大學理事會指出，「大學理事會使命為更多學生提供進入大學機會，幫助他們入學後獲得成功。」

譯稿人：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 年 10 月 19 日，世界日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573050/article-%E6%9B%B4%E5%A4%9A%E5%A4%A7%E5%AD%B8%E6%94%B9%E8%AE%8A%E7%AD%96%E7%95%A5-%E6%8B%9B%E7%94%9F%E4%B8%8D%E7%9C%8Bsat-%E5%85%A9%E8%97%A4%E6%A0%A1%E4%B9%9F%E4%B8%8D%E7%9C%8Bgre/>



無協議脫歐對英國高等教育計畫實施的影響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在英國退出歐盟的最後期限 10 月 31 日之前，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從 9 月中旬起暫停議會五週，此舉進一步加劇了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首相的計畫將剝奪國會議員其進行辯論和透過法律來影響脫歐結果的能力。無論英國脫歐的結果如何，從很多層面來看都將影響英國未來的發展。就教育而言，英國的無協議脫歐將如何影響高等教育的計畫實施，可以從下列兩個方向來看：包括 (1) 伊拉斯謨計畫 (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簡稱 Erasmus)，以及 (2) 跨國之間學術研究交流的程度。

一、伊拉斯謨計畫

伊拉斯謨計畫是一項由歐洲聯盟資助的高等教育交流計畫，於 1987 年成立，2014 年則在現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擴充了學生交換計畫的領域：進階伊拉斯謨計畫 (Erasmus+)，主要應用於歐盟現在所有教育、訓練及青年體育領域的高等教育學生。伊拉斯謨計畫原本主要是針對歐洲聯盟國家的大學，但為了使學術交流國際化，亦加入了伊拉斯謨全球高等教育計畫的聯合學程 (Erasmus Mundus)，是以歐盟國家為主的全球性跨國學術研究和教育整合計畫。此計畫包含了三個項目：

- (一) 聯合學程
- (二) 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合作
- (三) 歐盟高等教育推廣活動

此計畫提供大學生在另一個歐盟國家或地區有一年的交換學習課程。然而脫歐對高等教育的衝擊，主要在於英國將不再適用於伊拉斯謨計畫中的歐盟國家條款。因此，伊拉斯謨計畫針對學生的權益，呼籲英國政府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離開歐盟後仍然應該繼續參與該計畫，若英國政府在沒有達成替代性的第三國協議或其他安排的情況下直接脫離伊拉斯謨計畫，這將對歐盟及英國的大學，學院都造成極大的困擾。英國教育部說明其正在努力談判一項新的

協議：若英國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離開歐盟，英國政府將保證為成功申請英國進階伊拉斯謨計畫的學生提供獎學金的補助保障，幫助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讓此計畫不至於受到無協議脫歐後政治因素轉變的影響。

二、跨國之間的學術研究交流

英國脫歐對高等教育的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英國與其他國家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問題。由牛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s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執行的英國脫歐研究項目中一部分的分析報告指出，根據研究數據顯示，英國與歐盟國家的大學之間學術交流聯繫緊密，而與其他國家的聯繫反而相對薄弱許多。此研究是透過比較分析各個國家間的共同著作(co-authorship)與整體合作模式(cooperation)的平均值得分來檢驗了英國與其他國家的研究合作實力。

大致而言，研究結果顯示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其合作的可能性：預期的學術合作標準值為 1，因此得分 1.5 表示與合作國家有緊密的聯繫，與標準相比強度很高，而 0.75 分則比預期的合作標準要低得多。研究結果顯示，在國際上的學術交流，學者們儘管發表了大量共同撰寫的論文，但兩國之間的聯繫強度可能低得令人驚訝。

歐盟國家的分數平均落在在 1.01 至 2.16 之間。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關係最為密切，平均值為 2.16，學者們共同發表了 2621 篇的學術著作。其他相似的強勢合作關係有：

- (一) 歐洲國家：英國與希臘 (1.74)，英國與荷蘭 (1.5)，英國與丹麥 (1.43)
- (二) 非歐洲國家：英國與新西蘭 (1.35)，英國與南非 (1.33)，英國與澳大利亞 (1.19)

相對弱勢的合作關係國家：非歐洲國家：英國與美國 (0.77)。其中與亞洲國家的學術合作也是相對弱勢：英國與新加坡 (0.77)，英國與印度 (0.67)，英國與中國 (0.62)。

以上的研究數據顯示出美英兩國的合作並不像期望的那樣強大。長期以來，支持脫歐的政治聲音一直鼓吹脫離歐盟之後，英國科學家將能夠專注於更廣泛的全球合作，特別是一旦英國離開歐盟，與美國，中國和英國聯邦成員國的合作。但是，從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簡稱 NSF）獲得的數據強調，為了要重新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英國政府將需要提供更多能協助國際間的學術交流的計畫。

英國首相 Johnson 宣布，將為英國脫歐後的領先研究人員推出快速簽證計畫，並在無協議脫歐的情況下為英國學者申請資助提供後續的配套辦法。Johnson 首相希望英國能繼續成為全球科學的超級大國，但科學領導人 Marginson 教授表示，雖然英國脫歐後很難彌補失去獲得歐盟框架下研究計畫的機會，但也凸顯了與東亞國家在學術合作上更緊密的聯繫是另一種可能性。

資料來源：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14 Aug 2019, 'Weaker' research ties outside Europe pose Brexit challeng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weaker-research-ties-outside-europe-pose-brexit-challenge>

The Guardian, 30 Aug 2019, Concerns raised over Erasmus student scheme as no-deal Brexit looms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aug/13/concerns-raised-over-erasmus-student-scheme-as-no-deal-brexit-looms>

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從起初的 700 名學生到目前超過 5 萬名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在 1994 年，25 年以前，奧地利設置了第一所專業高等學院。但真正的先鋒者是福拉爾貝格邦的雷根拿 (Hubert Regner)，他在 1992 年就已經開始了這個嘗試。

雷根拿他們一開始是提供自動生產學專業學程，之後 92 年到 94 年間，有其他 9 所的專業高等學院分別在克雷姆斯、艾森斯塔特、威爾斯以及維也納等地陸續建立，共有約 700 名學生。之後總共有 21 所專業高等學院提供超過 480 個學程，到今日專業高等學院共有 53,400 名學生就讀，在未來的三年裡預計學生人數將增加到 57,000 名。

雷根拿認為這件事在一開始時是很簡單的原因：因為產企業界需要是專業高等技術資格的人力，同時在鄰邦德國是 20 年前就開始這樣的模式，德國專業高等學院開始於 1972 年。

現階段奧地利的專業高等學院主要學程是經濟商業部分占 38%、工程領域占 37%，13% 為健康相關學程，8% 是社會學，其他 10% 是藝術軍事與自然科學。

學生主要來源是來職業高等學校，佔 39%，第二是一般文理中學，佔 32%。隨著健康護理以及社會學學程的加入，女性就讀比率也逐漸增加，現階段正好佔了一半的比率。所有的學程基本上都有足夠的學生申請。以 2018 年新提供的 20,960 個位子來說，共有 58,660 人提出申請。可說是平均三個人爭取一個位子。

對於這樣的發展，雷根拿事實上非常滿意，但在此同時他也提出了一些應該注意的地方。他認為專業高等學院要保持彈性來面對新的挑戰，不要受官僚體系的約束，這是正確的做法；但同時也必須要注意一些負面的影響，並不是每一個區、每一個市長都必須要為當地爭取設置專業高等學院。

對於專業高等學院主要的挑戰，他認為主要仍是在財政方面，還有就是研究的應用與產業結合的問題

譯稿人：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 年 9 月 17 日，奧地利新聞報，Fachhochschulen: Von 700 auf mehr als 50.000 Studenten

<https://www.diepresse.com/5691402/fachhochschulen-von-700-auf-mehr-als-50000-studenten>

波蘭與德國合設科學卓越中心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波蘭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Nencki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Biology）成立 Dioscuri Centre for Evolutionary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of Astrocytes 及 Center for Metabolic Diseases，該等機構的落成為波蘭與德國共同執行科學卓越中心計畫（Dioscuri Centre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的合作成果，日前在波蘭科教部長 Jaroslaw Gowin 及德國教研部長 Anja Karliczek 見證下舉行啟用典禮。

科學卓越中心計畫由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簡稱馬普學會）發想，旨於從人本角度厚植中歐與東歐國家的科學卓越，在該地區建立前瞻研究中心，全方位支持願立足該區進行研究的傑出科學家，德國大學或德國研究機構將是中心的學術夥伴，促進雙邊合作。

波蘭是第一個重點合作國家，波蘭國家科學中心（National Science Center）與馬普學會於 2017 年簽署合作協議後隨即首次受理申請，領域包括自然科學與技術、生命科學、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2018 年公佈審查結果，Aleksandra Pekowska 博士與 Grzegorz Sumara 博士自 45 項申請案中脫穎而出。

Aleksandra Pekowska 博士前於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從事研究工作，將主持 Dioscuri Centre for Evolutionary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of Astrocytes 的研究計畫，德國的合作夥伴為柏林馬克斯·普朗克分子遺傳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olecular Genetics）Martin Vingron 博士。Grzegorz Sumara 博士則負責 Center for Metabolic Diseases 計畫，過去在德國符茲堡大學 Rudolf Virchow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Biomedicine 工作時的同事 Martin Eilers 博士將是未來的合作夥伴。

科學卓越中心計畫 5 年為一期，每期補助經費 150 萬歐元，每年至多補助 30 萬歐元，由波蘭科教部及德國教研部共同出資，獲外部專家審查認可執行成效良好者可再獲補助 5 年，目標於波蘭設立 10 個中心。

作者/譯稿人：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波蘭通訊社 Polska Agencja Prasowa (2019, Septemebr 17)
“Warszawa/ W Instytucie Nenckiego otwarto dwa Centra Dioscuri”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19 from
[http://naukawpolsce.pap.pl/aktualnosci/news%2C78626%2Cwarszawa-w-
instytucie-nenckiego-otwarto-dwa-centra-dioscuri.html](http://naukawpolsce.pap.pl/aktualnosci/news%2C78626%2Cwarszawa-w-instytucie-nenckiego-otwarto-dwa-centra-dioscuri.html)



越南核醫學與世界接軌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越南在應用核能治療疾病，特別是癌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越南核能協會主席 Vuong Huu Tan 博士與 Viet Times，就該國如何在醫學中使用核能技術進行會談。

越南在醫療保健中應用核能的世界板圖在哪裡？越南長期以來一直廣泛使用核能，特別是在醫療保健方面。自 1923 年以來，我們在國家癌症醫院--K 醫院 - 使用放射治療癌症。

與該地區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現在處於上述平均水平。基本上，除了特殊或新開發的技術外，越南的核子醫學已趕上先進國家。

但有些事越南是在世界上領先的。例如，線上加速器在癌症治療中的應用。早在 2006 年，全國只有一個加速器。現在有超過 60 個。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並非每個國家都能達到。

越南各種醫療機構都提供最先進的癌症早期檢測技術。在過去，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出國獲取最新技術，但現在越南也擁有現代機械也比其他許多國家更熟練的醫生。患者能以接受的成本，獲得高品質的治療，不再需要出國治療他們的疾病。

可悲的是，並非每個患者都信任國內治療。其他國家的技術，特別是一些區域的技術並不比越南的技術好，而我們擁有更多臨床經驗的醫生甚至超過了國外的醫生。

統計數據顯示，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外國人來到越南進行廉價但高品質的治療。

越南應如何推動核能在醫療保健領域的應用？在我看來，我們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如何依據發展方向計畫鼓勵在醫療保健中使用核能。如有必要，我們可以向私營部門開放該領域，以促進核能應用。

由於核能是一個特殊的領域，除非我們能夠管理安全的問題，否則社會不安全感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必須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以確保使用原子能時的安全。我強烈建議越南必須再次審視法律問題並做出適當調整。

此外，我們需要一個從中央到市級的有效管理系統，以及增加該領域專業人員的數量和品質。

核能可治療疾病，特別是癌症方面的有效性，早已獲得證實。但

是使用它有什麼問題嗎？

在治療中使用放射線最關心的是，如何保護人們的健康免受太多輻射導致癌症。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在越南經常被忽視。使用輻射的好處超過風險是至關重要的。其次，如何優化輻射的使用 - 意味著如何計算患者接受最小輻射劑量並仍然獲得所需的結果。

關於這兩個原則，我覺得越南的醫療機構不太關注它們。可能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是缺乏對這些設施的工作人員的培訓。另一個是許可與檢查方面的法規鬆懈。總而言之，社會面臨著真正的風險。

您剛才提到了人力資源方面的挑戰。我們能夠滿足該領域人力資源的需求嗎？

目前人力資源的質量和數量與該國原子能的廣泛使用不相符。該領域發展很快，但人力資源培訓相當有限。此外，越南到目前為止只注重輻射安全培訓，但忽視了放射源的安全性。我們也缺乏關於專業培訓與事後許可工作的具體規定。這就是我們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

資料來源：2019年8月31日，越南網電子報

<https://vietnamnet.vn/en/society/vietnam-s-nuclear-medicine-catches-up-with-the-world-563153.html>

德國已成為非英語系國家留學國首選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教研部 Karliczek 女士表示：國際大學生、後進學者對我國專業人才的補充越來越重要。

德國目前已經超過法國這個非英語國家而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來該國學習，其受歡迎程度僅次於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外國學生最多的國家。德國作為外國科學家的研究國，甚至在全球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三位；此結果來自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er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簡稱 DAAD）暨德國高等教育暨學術研究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 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簡稱 DZHW）於 2019 年 8 月 15 日共同發布有關德國大學與學術研究國際化趨勢之第 19 號刊物「全球開放的學術 2019（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19）」，此為德國境內統計大學生和研究學者國際移動性的主要刊物。

教研部長 Anja Karliczek 藉此報告的公開時機表示：「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學生和研究學者受到德國的吸引，我們的大學與學術界在全球社會上已越來越具吸引力。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所在地在全球也越來越吸引人。我們對此感到驕傲，並且在未來還應更好。研究報告不只顯示德國學術與大學系統極高的品質，並且在過去幾年中將近有 4 萬 2000 位來自各國的德國大學畢業生們也為我們帶來重要且仍在成長的未來專業人才潛能。」

在德國的 2017/2018 冬季學年度中，一共有 37 萬 5,000 外國大學生在德國註冊，其中共有 28 萬 2,000 人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學生，並擁有大學入學許可（即所謂的「國際學生（Bildungsausländer）」），他們多半是因為就學或人道原因（譯註：例如難民、國外民主異議人士等）留在德國。從 8 個滯德難民人數最多的來源國家中（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奈及利亞、厄利垂亞、伊朗、巴基斯坦和索馬利亞），共有 2 萬 4,000 個國際學生在德國大學就讀，其中大部分據推測為留德難民。DAAD 針對難民大學方案所挹注的經費乃由教研部補助，目前此挹注資金已對這些學生在大學裏的融合作出貢獻。敘利亞難民目前在德國大學內成為外國學生中第 6 大的學生族群。

今年的報告焦點在於解析留德就讀學生其國際移動之動機。透過 DZHW 舉辦的第 21 次問卷調查可得知：多過半數（52%）的在德受

調國際生表示德國是他們就讀大學的首選國家，而對於 79%的受訪學生而言，職業生涯與大學相關的動機是影響他們決定的重要因素。其次，83%的外來大學生期待透過學位獲得良好的工作機會，76%想獲得德國大學的高品質教育，而 74%希望獲得國際認可的畢業文憑，而 71%則因為德國大學的良好聲望而決定就讀。德國是個優良的學術之地也已口耳相傳：83%的國際學生表示，他們將推薦自己的朋友與認識的人來德國就讀大學。

德國大學生也不遑多讓，他們的移動性非常地高。2016 年大約有將近 14 萬 5,000 位德國學生在一所國外大學就學並且取得學位。大約 1/3 的德國學生在德國就學時，均有過在國外大學進行與本科系相關的學習經驗。

DAAD 主席 Prof. Dr. Margret Wintermantel 女士表示：「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德國大學生會出國...即使如此，我們仍應加強促進年輕人到國外去體驗國際經驗的價值。透過最新的『國際化·師範專案(Lehramt.International)』與『國際化·科技大學(HAW.International)』兩方案，我們針對此 2 個移動性較低的重要族群開啟了迎向國際的道路。從對於我們許多促進方案的迴響中，我們確定它們符合時代精神，而這些促進方案也增進了大學院校和大學生們與全球聯網。」

在德國研究的外國科學家們同樣以國際化水準強化了德國學術系統的品質。根據 2017 年的統計，超過 10 萬 8,000 位外國科學家在德國工作，其中約有 4 萬 7,500 位員工為德國大學中的研究人員，而在大學體制以外的 4 大研究機構中共約有 1 萬 2,000 位科學家，並且有超過 4 萬 6,000 千人的外國客座研究人員與科學家們在德國的學術體系中任職。DZHW 中心學術研究主任 Prof. Dr. Monika Jungbauer-Gans 女士指出：「在德國大學中的國外學者人數在過去 10 年中幾乎已經增加了一倍，這個強大的發展趨勢為德國的大學教學與研究帶來全新創意性的推動力，並且確保我國與國際的接軌實力。」

撰稿人/譯稿人：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9 年 8 月 15 日，德國教研部 2019 年 8 月 15 日網頁新聞：「德國已成為非英語系國家留學國首選」

<https://www.bmbf.de/de/deutschland-bei-internationalen-studierenden-begeehrt-9380.html>

澳洲教育部要求提高國際學生入學英語能力檢定的透明度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2019年5月的一項調查發現，澳洲有些大學為了爭取支付高額學費的海外留學生，不但降低入學英語要求甚至豁免考試成績，英語能力不佳的留學生在學業上十分吃力，然而，大學的代表機構堅稱留學生的考試通過率與當地生不相上下，否認對留學生英語檢定的衡量標準存在漏洞。

據查，2016年起澳洲政府施行簡化留學簽證手續，使得澳洲大學在錄取學生方面更加自主，留學生只須向學校證明具有合格的英語能力，無須對教育部提交英語能力證明的舉措下，欠缺透明度。

根據澳洲聯邦教育部近期發布的新聞稿，透過10月1日生效的《澳洲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案》(簡稱ESOS法案)更新法規，澳洲大學代表機構將提供更多攸關國際學生申請入學時應符合的英語能力資訊。

澳洲大學代表機構報告學生在申請簽證時所要求的英語檢定成績，特別針對兩大重點革新：

- 一、有關學生申請學生簽證時所需通過的英語能力檢定資訊。
- 二、有關為何學生在申請簽證時免於提供其英語能力證明的資訊。

澳洲聯邦教育部長Dan Tehan表示，新措施將有助於確保澳洲國際高等教育部門的可信度。他說：去年高等教育為澳洲創造了350億澳元及24萬個就業機會，因此，保護高教體系至關重要。

新規定將提高透明度，並有助於確保澳洲大學招收的是具有合格英語技能的國際學生。Tehan部長表示，政府通過修訂國家語言強化課程(ELICOS)標準以加強對海外學生英語能力的要求，按規定，所有提供ELICOS課程的機構現在均須滿足有關課程時數及教職工比例的最低要求。

譯稿人：黃慧琪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1日，澳洲聯邦教育部長新聞稿 **Improving transparency in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https://ministers.education.gov.au/tehan/improving-transparency-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面對時代變遷，學者批評法國技職教育改革裹足不前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從 1985 年設立高職文憑 (baccalauréat professionnel) 至今，改革技職教育、使之「再升級 (revaloriser)」的目標，在法國教育界一直沒有停過。歷年來的改革有大有小，不過是否能確實達到目標？對此，技職教育研究專家、南特大學 (Université de Nantes) 教授特羅傑 (Vincent Troger) 投書法國《世界報》，他在回顧技職教育歷史的同時，也反省過去的改革與其成效，並提出對未來的展望。

社會經濟變遷，技職教育輝煌不再

特羅傑認為，技職教育問題的根源在其成立並無有系統的政策支持，而是一連串巧合的結果。法國技職教育的原型是於 1939 年為因應二戰人力需求所設的臨時訓練所 (centres de formation improvisés) 制度，而這些訓練所在受德國控制的維希 (Vichy) 政權時代，更淪為納粹洗腦基層無業年輕人的工具。在戰後法國經濟穩定高速成長的黃金三十年 (Trente Glorieuses, 即 1946-1975 年) 間，接受技職教育者從戰時的四萬五千人成長到 1960 年的三十萬人，再到 1975 年的七十五萬人；技職教育的名稱也從「訓練所」變為「技術教育學院」(collèges d'enseignement technique, 1960 年) 與「職業教育中學 (Lycée d'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1976 年)」，並培養了戰後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當年進入技職體系的學生與今日相同，皆以出身基層家庭為主，但當時只要一畢業便可即刻就業，不僅薪資有集體勞動協議 (conventions collectives) 保障，更有充足的升遷機會。

不過隨著黃金三十年的結束，失業率的增加與第二/第三級產業的消長，也為法國技職教育的輝煌畫上尾聲。不僅如此，企業內部升遷機會也被大學技術文憑 (DUT) 與高級技師證書 (BTS, 相當於我國二專) 者佔據。到了 1970 年代末期，技職教育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變成只有中學成績不佳者才不得不選擇的一條路。是故，自 1980 年代起，法國教育當局便需面對以下三個核心難題：其一，當就業與升遷前景有限時，如何吸引成績較佳者選擇技職教育？其二，如何面對一方面要求更高水準勞動力，另一方面又給不出高薪的資方？其三，

如何調解一般高中科技組 (lycée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 與職業中學所學類似，導致直接競爭的問題？

不重視技職教育，學者批評歷代教育部長改革了無新意

面對這些問題，特羅傑指出法國自 1985 年以來，不論左派或右派執政，改革均是朝同一方向：增設高等技職教育並增加學生的選擇。左派技職教育部長梅蘭雄 (Jean-Luc Mélenchon) 於 2001 年將技職班修業時間從原本的四年縮短為三年，並向設有所有類科的職業學校頒布「全職學校 (lycée des métiers)」的稱號，以鼓勵各校廣設各類科。到了 2013 年，左派國民教育部長貝雍 (Vincent Peillon) 強調改革，但實則只是整合同一地區的各「全職學校」，成為「全職學園 (campus des métiers)」。時至 2018 年，出身右派的現任教育部長布朗凱也繼續著全職學園方向的改革。

對此，特羅傑認為由於法國技職體系太複雜，改革困難，導致過去三十餘年的各執政者的政策都了無新意。他指出，這些改革都純粹只是為了改善就業率，卻沒有給予技職體系平等的對待：最近布朗凱的高中畢業考 (bac) 改革把職體高校排除在外，便是明證。特羅傑強調，法國社會學家奈維爾 (Pierre Naville) 與弗里曼 (Georges Friedmann) 早於二戰方休便擘畫了理想的技職教育體系，他們指出在強調職業發展的同時，更要將他們的所學提升到人文關懷 (humanisme) 的層次。綜觀今日的情況，只有 15% 到 20% 擁有最高級技師證書的技職人才可能達到此目標，教育當於應當繼續努力，才能讓技職教育成為學子嚮往的「康莊大道 (voie d'excellence)」。

譯稿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 年 9 月 24 日，法國《世界報》

德國政經界與工會聯署「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 2019-2021」強化雙軌式教育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聯邦政府、聯邦勞動部、企業界、全國總工會暨各邦政府一同於2019年8月26日假德國經濟與能源部簽署一項「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 2019 – 2021 (Allianz für Aus- und Weiterbildung)」宣言，所有簽署的單位以此表明支持更加強化的技職教育，並且將對於各單位的活動領域和具體的措施進行重新定位。此於2014年底成立的聯盟，持續致力於強化技職教育的吸引力、品質、功效與產能之發展。

德國經濟部長 Altmaier 先生表示：「雙軌式技職教育對於一精準確實的專業人才教育，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界而言有著關鍵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我們繼續歷久不衰的『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合作感到特別高興。透過共同的合作，在我們面臨技職教育市場的挑戰時尤能獲得更佳的掌握，並能將年輕人和提供技職訓練崗位的企業單位更妥善地搭配在一起，且針對雙軌技職教育所面臨的數位化新挑戰作出調整。」

德國工會聯合總會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簡稱 DGB) 副會長 Elke Hannack 女士強調：「『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可以回顧過去的成功結果，自2014年開始，全國提供學徒實習教育的企業名額已經提高，此趨勢轉變已達到目標，現在我們要繼續下一步。畢竟仍然還有將近140萬介於20至29歲間的年輕人沒有完整的技職教育履歷，因此我們企圖設計彈性化的『協助式技職教育 (Assistierte Ausbildung)』以為更多的目標群組開放更多機會。因此我們特別想要著手某些新計畫，例如針對技職教育市場有問題的區域予以協助等等。」

德國工商業總公會主席 Dr. Eric Schweitzer 先生亦申明：「我們共同的『聯盟』在過去4年當中帶來了不少成果。即使中小學生人數降低而就讀大學的趨勢方興未艾，然而目前提供技職教育實習的企業與其學徒之間簽訂的培訓合約趨勢已經回緩抬升。我們的目標仍是繼續協助青少年免於失落，同時也盡可能地保住既有的實習工作崗位。我們企圖強化職業導向以及技職教育顧問工作，並且繼續確保技職教育的品質，以及令技職教育的性能與效率更加地吸引人，例如透過完

建學徒赴國外學習的可能性，和推廣我們高品質的進修、深造學位。」

現任「德國各邦文教廳長聯席會議主席(Kultusministerkonferenz)」之黑森邦文教廳長 R. Alexander Lorz 教授則說明：「技職教育不只是德國經濟界競爭力與創新能力之保證，同時對於社會中不同族群的整合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為了鞏固此整體社會功能的穩定未來，所有在此領域中的參與份子必須共同行動並且作為廣義的政治聯盟。各邦政府將扮演『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之可靠與強大夥伴的角色，以提高技職教育體系的吸引力和生產力。」

德國聯邦勞動及社會事務部長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Hubertus Heil 亦提出其看法：「在企業中所接受的技職訓練將會有前景，因此我們想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給予技職生們更好的支持，例如藉由勞動市場政策等。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意願，因為我們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人。也因此，我們為技職教育明顯地付出更多助學金，也對難民們開啟教育補助的可能，此外我們並將繼續研發『協助式技職教育 (Assistierte Ausbildung)』方案，使得這些教育方案能夠穩定持久地開放給更多技職生；而這些措施之所以成為可能，則均歸功於『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

教育部長 Anja Karliczek 聲明：「技職教育對年輕人提供穩固的基礎，有利與建立他們充滿多樣性升遷機會的成功職業生涯。在『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中，我們想共同持續編寫這個成功的故事。德國聯邦政府在此以全力支持此舉：內閣於今年 6 月通過本部的最新法律草案設計，接下來的一步將是對於根據德國聯邦教育資助法頒定的『職業教育晉升助學金 (Aufstiegs-BAföGs)』進行現代化改革。技職教育應該在未來的明天與更久之後仍能開啟卓越的職業遠景。」

透過此最新宣言，所有的聯盟夥伴已針對中央式行動領域以及具體的措施獲得共識，將共同盡力為所有人造就合格的職業文憑，其目的在讓更多青少年能夠尋得企業內的實習崗位，同時能有更多企業獲得足夠的學徒在他們的企業中學習、工作。

青年人在尋求技職教育崗位時的移動性應該透過不同的方案予以支持。此外，「技職暨進修教育聯盟」希望藉由強化青年人的現代化進修機會與職業生涯途徑，讓技職教育成為與大學教育擁有同等價值的職業替選方案。

撰稿人/譯稿人：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9年8月26日，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GB Bundesvorstand），網頁新聞

<https://dgbmailing.elaine-asp.de/go/tjawotixoz63jaavzcx1p5b4he1hbogso1jc4044g6sg/1922>



加國校園設立投票所維持年輕人投票率增長趨勢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在 2015 大選，大量學生和年輕人參加投票後，加國選委會和學生組織在本月聯邦大選前擴大投票計畫。

10 月 21 日聯邦大選前夕，全國各地的校園團體都肩負著提高學生投票率的使命 - 從初次投票選民的模擬投票到保證學生可以通過投票獲得獎勵。加拿大學生協會聯盟 (CASA) 主席 Adam Brown 表示，不同的組織正在盡最大努力使學生感到自己有重要發言權。如果所有學生都前往投票，的確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在 2015 年顯而易見，當時自由黨因有驚人的 45% 年輕選票支持，進而成為多數政府。在此之前，加拿大 18 至 24 歲的年輕選民投票率長期低落，就在 2015 年躍升至 57%，這是該年齡層十年來最大增幅。在 Alberta 大學就學的 Brown 表示，希望 2015 年只是青年投票率的轉折點，在這次及往後的選舉中都能看到類似的結果。

為了保持這種趨勢，CASA 今年秋天推出「前往投票」(Get Out the Vote) 活動，到 10 月的第一週已有 20,900 個投票承諾。其他由學生主導的計畫也加入，例如由數十個學生協會簽署的「全國學生信」(National Student Letter)，強調對學生選民至關重要的選舉議題。在一次成功的試辦中，有 70,000 名學生在加國 40 個校園投票所投票後，今年聯邦政府將在全國 115 個以上的校園開展「校園投票」(Vote on Campus) 計畫，該計畫可能會達到 130 萬個學生投票。

領導 Ryerson University 選民參與運動的 John Beebe 表示，校園參與至關重要，因為是學生和大學社區表達自己聲音，也是向政黨證明大學生參與力的最佳機會。

Abacus Data 數據公司創辦人 David Coletto 表示，因為年輕選民需要一個「一致」(unifying) 的動機去投票，所以很難預測今年投票人數。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次大選似乎只是在敘述雜亂無章的政策，一個激勵人心的理由似乎還沒出現。而像 CASA 那樣的活動似乎可以有效地激發投票動機。

根據 Abacus Data 在 2015 年選後調查，超過三分之一的青年選民表示，鼓勵一個致力於增加年輕選民投票率的組織。最近一次針對高中生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表示計劃在 2019 年投票。根據加拿大選舉局數據顯示，18 歲至 38 歲包括在大學關鍵年齡人口的年輕人是加國最大的投票族群，佔選民的 37%。

Brown 先生表示，希望看到這種趨勢增加，不僅學生能與學生組織有更多互動，而且在校園投票機會也將大大增加，不必花時間開車回故鄉投票，將造成很大的改變。

撰稿人/譯稿人：林宥嫻

資料來源：2019 年 10 月 8 日，Salma Mahgoub，「Campus initiatives seek to maintain trend of growing turnout among youth voters」，University Affairs
<https://www.universityaffairs.ca/news/news-article/campus-initiatives-seek-to-maintain-trend-of-growing-turnout-among-youth-voters/>

德國政治文化轉變，學術自由堪憂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激進行為逐漸增強的新發展已經在過去幾年中嚴重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重要的自由民主價值，例如言論自由和寬容價值正激烈地備受質疑。這些極端的趨勢對於德國與美國的科學界將帶來什麼後果，正是 2019 年 8 月 28 至 29 日，假美國洛杉磯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的生前住處(Thomas Mann House)所進行討論的主要議題。

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簡稱 HRK)主席 Dr. Peter-André Alt 教授與會時表示：「民主的社會乃建立於自由的意見交換、可驗證性的言論競爭以及理性的解決方案；這個基礎同樣對於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教學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因此高等教育對於目前的政治文化變遷擔負著思考辯論的特殊責任。高等教育必須科學式分析目前的社會程序，並且在社會的辯論中參與意見，以及能對於自己作為開放交流之地的功能性進行批判和發展。」

德國學術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簡稱 DFG)副主席 Dr. Julika Griem 教授強調：「即使身為促進研究的機構也必須保障學術自由，並強化其價值取向與程序，同時也應對其進行檢驗。在此，一方面，研究學者與研究機構的自治權必須獲得捍衛，另一方面，學術研究必須奠定於社會環境的基礎上，而不應受制於蠱惑的勢力，並且能夠基於事實的力量而退一步想。在多元化的社會裏，是無法避免在人類社會中針對知識進行爭辯，以及區分知識和良知。我們必須共同為教育和研究機構的規範性基礎奮鬥。僅是將這類爭論轉變成量化與自動化的過程，是不夠的。」

CalArts(加州藝術學院)前校長 Steven Lavine 暨湯瑪斯·曼之屋顧問團主席表示：「政治性與兩極化的陣營令建設性的公開討論越形困難，即使是針對最急迫的主題亦然。因此堪稱務實辯論與領悟道理之原鄉的大學院校在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價值問題上，由於大學在複雜問題上尋求答案的重要價值向來對於廣大人群有著模範式的性格。今天各大學最重要的挑戰為對抗外部嚴重的毀滅性影響以及內部存在的張力，此兩者均將威脅大學執行它的任務。在美國前參議員麥卡錫(McCarthy)時期以及在納粹執政時期的德國大學都已

顯示，再優秀的大學都可能誤入歧途。」

資料來源：2019年8月28日，網頁新聞，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簡稱 HRK）

<https://www.hrk.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pressemitteilung/meldung/wandel-der-politischen-kultur-gefaehrdet-wissenschaftsfreiheit-4618/>



英國教育標準局新學年度教育 視導項目，納入文化資本引發討論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英國教育標準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簡稱 Ofsted）在今年九月初宣布新年度的教育視導項目中，將檢視學校在提高學生「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教育標準局的這項宣布，則引起教育界一番討論。

究竟甚麼是「文化資本」呢？在馬克思（Marx）的思想中，資本（capital）扮演關鍵的角色。擁有資本的統治階級利用資本來控制生產的工具；反觀勞動階級，因為缺乏資本，無法取得生產工具，也就面臨被統治階級宰制的處境。在 1970 年代，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借用了資本的概念，並將此概念延伸至其他形式的資本，例如統治階級者擁有的不只是物質和經濟的資本，還擁有文化資本。文化資本涵蓋了一個人如何展現自己的地位：如個人的氣質、習慣，穿著衣服的風格，以及他們在與其他人互動時如何做出適宜的回應等等；文化資本也可能反映在上餐館用餐時，個人如何展現適宜的餐桌禮儀，如不同尺寸的湯匙該使用在何種餐點，以及用餐後要怎麼擺放餐盤等。除此之外，文化資本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慣習」（habitus）、某方面的才能；可以是鑑賞藝術作品的力量；也可以是取得某種證書，例如博士學位等。

文化資本的重要性在於，當中產及上流階級掌握了經濟資本，展現其物質方面的優勢並掌控整個社會資源時，文化資本的匱乏，會讓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狀況更加惡化。某些孩子之所以能夠在學校中有強勢的表現，就是因為他們在家中可以獲得更多的文化知識與經驗，相形之下，弱勢族群的孩子就相對居於劣勢。

在教育標準局的規劃中，「教育機構必須展現出，在其課程規畫之中，能夠讓他們的『所有學生，特別是弱勢學生』...取得足以在他們未來獲致成功人生的知識和文化資本，如此才能夠取得較佳的評比成績」（註 1），此舉也將文化資本的概念跟現行的國定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掛勾在一起，目的是希望教育學童成為未來的公民時，能夠具備必要的知識。在宣布此項變革之後，旋即引

發教育界的關切與討論，大家好奇的是，文化資本究竟該如何評比？以及這樣應用文化資本的方式，是 Pierre Bourdieu 的本意嗎？教育標準局是不是誤用且錯誤詮釋了文化資本的概念呢？

此項視導變革的支持者表示，此項變革基本上只是希望提供更多的人更好的教育，不要讓教育變得只有服務少數人。支持者認為，反對這項變革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middle-class professionals）身為既得利益者，根本忽視了弱勢學童的受教權益以及這些學生貧瘠的教育經驗。

事實上，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早在 2013 年，便提出了類似的構想，「增加文化資本，意即習得知識，是社會流動的關鍵」（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 is the key to social mobility）。除此之外，另外一個意思相似的詞彙「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也經常出現在前教育部長 Nick Gibb 的談話之中。

教育標準局的新措施引發了諸多迴響，許多專家表示，這些政策制定者似乎忘記了，Pierre Bourdieu 當初提出文化資本概念時，也指出了教育本身其實是有目的地擴散不平等的兇手之一，而這並不是現今的社會有辦法扭轉的問題。例如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副教授 John Yandell 就指出，如果認為單憑學校之力，就可以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現況，這真是太天真的想法了。劍橋大學的 Diane Reay 教授也認為：「這項要求實在是非常粗糙且簡化了學習的模式，非常獨裁也展現了菁英份子的傲慢。文化資本的關鍵牽扯到特權階級的生活型態，並不是學校能夠將之獨立出來教給來自貧困和勞工階級家庭孩子的」。

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的知名課程社會學家 Michael Young 教授也不客氣地指出，教育標準局完全誤解了 Pierre Bourdieu 的理論，好似透過學校可以連根拔除存在社會中的不平等。文化資本並不是單獨靠課程可以提供的，這還必須考慮到學校所處的學區環境、學童的起點行為。課程改革沒辦法減輕不平等，甚至這樣的要求，還可能打擊教師士氣，讓教師對教育心灰意冷。他特別引用英國社會學家 Basil Bernstein 的話來回應教育標準局的這項要求：「教育無法補償社會（education cannot compensate for society）」。他也呼籲教育標準局，如果此舉勢在必行，一定要好好加強教育視導員的專業訓練，才不致得到反效果。

Yandell 副教授另外指出，文化資本的概念，隱含了某些文化的地位是優於其他文化的想法。例如現行的英格蘭國定課程中，就特別強調「古典文學」，但其中刪除了學生必須學會分析「來自其他文化或傳統的寫作」項目，這就傳遞了一個訊息：誰的寫作比較有價值呢？Jane Austen（註 2）是，但顯然不是 Chinua Achebe（註 3）或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註 4）的寫作。

校長協會（Headteacher unions）對此也提出質疑，認為教育標準局並未對何謂文化資本訂下明確的定義，這將使得學校在執行時面臨困境。教育標準局則對此舉提出說明，其全國主管（national director）Sean Harford 表示：「新視導項目的精神在於，我們不是只看重考試及測驗的結果，而是希望檢視課程是否有好好設計、完整地傳授給孩子，讓孩子們能夠取得必要的知識及文化資本，日後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

無論學校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應對，或是視導員們要如何進行視導，都值得大家一起來後續追蹤及觀察。

註 1：關於教育標準局的視導項目細節，請參考英國政府網站所提供之教育視導

冊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28469/School_inspection_handbook_-_section_5.pdf

註 2：英國小說家。知名作品包含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等。

註 3：奈及利亞著名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

註 4：奈及利亞作家，小說家。

資料來源：

Gov, 20 Aug 2019, Ofsted is changing how it inspects schoo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ofsted-is-changing-how-it-inspects-schools>

Guardian, 3 Sep 2019, Ofsted plan to inspect 'cultural capital' in schools attacked as eliti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9/sep/03/ofsted-plan-inspect-cultural-capital-schools-attacked-as-elitist>

TES, 7 Sep 2019, 'Ofsted now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https://www.tes.com/news/ofsted-now-does-more-harm-good>

TES, 15 Sep 2019, Ofsted,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cultural capital mix-up

<https://www.tes.com/news/ofsted-social-mobility-and-cultural-capital-mix>

Young, M., 9 Sep 2019, Cultural capital and curriculum: will OFSTED's new framework encourage better education in our schools?

<https://ioelondonblog.wordpress.com/2019/09/09/cultural-capital-and-curriculum-will-ofsteds-new-framework-encourage-better-education-in-our-schools/>



想改變課程陣容嗎？首先應分析整體課程設計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學術課程是高等教育的命脈，它們不僅要對學校有價值，而且要對學生有意義。課程內容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更，但這些變更往往沒有經過全盤徹底的檢視。如今，校方日益增長的財務壓力及激烈的招生競爭，使定期重新評估學術陣容變得至關重要。

《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最近發布了一份特別報告，題為《學術課程的正確組合：做出決定以新增、削減、擴張或縮減院系和學位》，該文探討如何進行課程審核或決定院校發展的優先順序，以及從何著手改變。該報告討論如何關閉、調整、擴展課程，以及優化課程安排。以下是該報告的重點節錄。

為了因應財務挑戰，大學常把重點放在削減開支上，或許會因此裁減某些課程。一所小型學院的前首席財務官，現為顧問的理查·斯塔伊斯洛夫 (Richard Staisloff) 說，院校的領導者不太會去審視他們工作的核心——尤其是從整體的角度分析他們的學術服務。

斯塔伊斯洛夫說：「應該將學術課程視為一個商業組合，而不僅僅是課程的集合。」商業組合的概念使大學能了解各個課程計畫的財務狀況，以及它們是否符合機構的目標，包括它們對招生和學生成就的貢獻。斯塔伊斯洛夫說，每個學程都應該根據其使命（學校的專長）、市場（學生想要的方向）、和利潤（課程要能產生收入以支持使命）三方面進行評估。以下是三個關鍵步驟：

一、仔細檢視課程帶來的學生收益。斯塔伊斯洛夫說，數據視覺化有助分析，例如在座標的四個象限上依照各個學程所吸引到的學生申請人數及實際註冊率來定義學程修正的方向。申請人數少但收益高的課程需要更好的行銷和招募策略；申請者眾多但收益率較低的課程則應該重新設計課程，把學生的興趣轉化為收益，並同時創造課程獨特性，將自校提供的課程與其他院校同類型的課程區分開。此外，申請人數少且收益率低的課程應針對其課程目標的相關性和對機構的貢獻程度進行檢驗，例如檢視課程提供給外系學生的學分數多寡。進一步的分析可以整合繼續註冊率、課程

完成率、及學生的學業成效，以了解不同課程的效果是如何疊加或相互影響。

- 二、衡量課程的效率和產能。斯塔伊斯洛夫說，大學或許可以在不影響品質的情況下，以更低的成本辦學。為此，校方應評估檢查課程的組合、課程班級數、班級規模、選課率和教師課程發佈時間等因素。學生的累積學分數可以是另一項指標：他們是否經常超修課程，超過滿足畢業條件所需的課程數量？課程表該如何調整以因應學生的需求？例如增加或減少同一門課程的班級數、或是在不同的時段提供課程。
- 三、著重行政管理。學校需要什麼來支持其學術課程？斯塔伊斯洛夫說，任何課程方案審查都應該同時考慮校方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地進行行政管理。「總結來說，透過學術上和行政上的檢視，可以提高校方運作的透明度及問責度，有助於建立大學的永續發展模型以實現其教育使命及確保學生成就。」

撰稿人/譯稿人：Scott Carlson / Yung-Tsen Chen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15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Want to Change the Academic Lineup? First Analyze Offerings as a Whole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ant-to-Change-the-Academic/247348>

軟硬體量身打造，法國中學送身心障礙生走向康莊大道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法國教育當局自該國於2005年通過《殘障人士機會平等法案(Loi handicap 2005)》以來，便致力於推展「融合教育」(éducation inclusive)的理念：所謂融合教育，乃是將身心障礙學生和普通同儕放安排在同一間教室，一起學習。不過，在今年10月8日上呈國民教育部長布朗凱的一份報告卻顯示，時至2019年，法國在此方面仍不成功；對此，布朗凱指示將融合教育置為本學年的首要目標。法國《世界報(Le Monde)》認為，有鑒於目前各校無障礙設施有待建設、教師與職員訓練不足、學生數量過多、課程沒有調整、且一般大眾心態未調整的情況，要達到目標尚有困難。為此，該報走訪了位處法國大城里昂北郊「卡呂赫居赫」(Caluire-et-Cuire)的「艾莉-威紐公立中學」(Collège et Lycée Elie Vignal，含國、高中部)，以借鑒該校於過去三十五年間輔導身心障礙生，並實現「融合教育」的成功經驗。

師資課程為身心障礙生量身訂製，全法獨一無二

硬體設計上，艾莉-威紐中學全校均為無障礙空間，採用環形建築，不設台階。該校有學生一百餘人，其中的身心障礙生都是因為在原本的學校適應困難，而透過各省的「身心障礙者之家」(Maison départementale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MDPH)轉介而來。每個學生的情況不同，有些是慢性病患者，需要長時間照護；有些有行為障礙或學習障礙；也有人受到騷擾後，產生學校恐懼症。校長法齊(Bruno Facchi)表示，艾莉-威紐中學好似一座橋樑，在幫助身心障礙生補強課業，重振旗鼓後，再讓他們回歸一般教育體系。因此，每學年度都有一半的學生離開該校，另有一半的新生加入，每人平均只在艾莉-威紐中學就學一年半。

該校共有教師32人，雖然學生特殊，課程內容卻與一般學校無異，每班人數也符合標準，都安排在12人以下。《世界報》觀察到，從中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每班上課時教室的門都開著：對此，中學三年級的慕尼爾(Mounire)表示，這麼做是為了方便學生需要休息或需要醫療照護時，可以直接出入。同班的羅倫佐(Lorenzo)也說，

為了方便未來回歸一般教育體系，該校的課業與一般學校相同，只是課時分散較平均，以減少每日上課時間，並讓老師能個別指導。此外，每堂課結束時，是由老師到教室上課，學生毋須移動。身心障礙生在一般學校裡常受嘲笑或忽視，學習心情大受打擊。不過在艾莉-威紐中學，學童夏拉（Chiara）表示大家沒有承擔異樣眼光的壓力，都可以做朋友；輔導老師楓丹（Catherine Fontaine）則觀察到，身心障礙生通常與大人（尤其照護者）較合得來，與同齡人則較困難，故該校乃特別就學生交友的部分加強輔導。

整合各方資源，貫徹融合教育理念

根據法國社會學家托瑪傑（Serge Thomazet）的理論，要使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合併，並提供身心障礙兒童正常化的教育環境，不僅硬體上要允許，軟體配置上更須整合跨專業資源，方能見效。艾莉-威紐中學便呼應此觀點，其特點在於跨領域性與折衷性：它既不是醫療院所、也不是身心障礙者之家、卻有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Accompagnant des élèv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AESH）與護士進駐，又該校教師有都獲有（或正在準備）融合教育的專業資格。文學教師杜鵬歌（Nathalie Duponchel）與教師波西（Laurence Bossy）均認為，各種專業的通力合作再加上家長、學生的配合，是融合教育成功的不二法門。

經驗也顯示，在特殊教育中，輔導人員負有協助學生起居、社交、學業的責任，角色確實重要，但為了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也要注意不能讓學生太依賴他們。在艾莉-威紐中學，輔導人員負責的學生時常替換，以防止像一般教育體系中產生輔導與被輔導者間過度依賴的關係。儘管如此，學生們離開該校，回歸一般學校時，多仍依依不捨。如今，艾莉-威紐中學輔導身心障礙生的成功經驗透過該校老師的宣講，逐漸為各地教育機構所知。《世界報》認為，該校成功透過硬體與軟體設施的配合，將融合教育的理念付諸實行，值得效法。

譯稿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14日，法國《世界報》

學童濫用電子產品，法國學者警告恐致學力下降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根據一份關於使用電子產品的調查，2015 年全法國 6 至 17 歲的青少年，每天平均花 4 小時 11 分鐘在電子產品上，只有約 6% 至 10% 的青少年免於其害。同時美國一份調查也顯示，三歲幼童每日花在電子產品上的時間長達 3 小時，8 至 12 歲與 13 至 18 歲的青少年使用該產品的時間更分別長達 4 小時 40 分鐘與 6 小時 40 分鐘。為此，法國《世界報 (Le Monde)》訪問了任職於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NRS) 的神經科學家德沐傑 (Michel Desmurget)，後者長期關注青少年使用電子產品的議題，並於今年將其結論付梓。他認為，不論是電動遊戲或其他活動，只要涉及電子產品的使用，便須注意其對學童睡眠、注意力與智力發展的影響。

學童嚴重濫用電子產品，已成公共衛生危機

德沐傑表示，六歲之前是兒童神經發育的黃金期，因此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超過 15 分鐘，便會影響腦力發展。六歲之後，只要內容適當且不影響作息時間，每天應可以用電子產品約 30 分鐘至 1 小時；但數據顯示，青少年使用該產品的時間遠超過這個標準。德沐傑發現，由於神經無法承受電子產品長時間的刺激，且現在網路內容充滿腥羶色與毒品的資訊，濫用該產品除導致青少年注意力下滑，同時也提高焦慮症、憂鬱症與自殺的機率。此外，青少年玩手機不只會導致睡覺時間向後延，更因螢幕發出的光線刺激大腦而難以入眠。

其次，使用電子產品多了，與其他人言語交流的機會便減少：一份針對 18 個月嬰兒腦力發展的研究顯示，每在電子產品上多花半小時，幼兒產生語言能力遲緩的機率便增加 2.5 倍。德沐傑表示，使用電子產品愈多，寫作與閱讀的時間也同樣減少，因此對後兩者的能力培養有負面影響。他更援引台灣於 2015 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經驗，作為法國未來立法的借鏡：根據該法，讓兩歲以下幼童時用電子產品，或讓未成年人(2-18 歲)使用超過 30 分鐘、未使其休息者，皆受罰鍰。德沐傑表示，他自 2011 年後便主張青少年濫用電子產品已達到造成公共衛生危機的程度，國家應強勢介入。

為防濫用，電子產品進入校園尚需考量

近年來，法國有不少公立學校推廣使用電子產品作為教學工具。德沐傑認為，以之完成作業、學習寫程式、看教科書等，似無疑問，但紙質書本還是有助於增進學習效率。一方面，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的研究，學生改用電子產品學習後，成績顯著降低；另一方面，師生間的教學相長，總是優於機器。此外，若全面推廣電子產品學習無疑會擴大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的學力差距。

儘管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報告顯示使用智慧型手機及社群媒體對於孩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有負面影響，但若完全禁止中學一年級(sixième)至高中一年級(seconde)的學生使用手機，則可能造成青少年社會邊緣化，於此，德沐傑建議父母還是應該適度減少子女使用電子數位產品的頻率，並使用非智慧型手機。

譯稿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23日，法國《世界報》

以前瞻群聚網絡迎接德國的未來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今日全球用於技術革新的發展時間已經越來越短，在發明與量產之間常常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若與 1872 年的德國作比較，一架塑膠射出成型機從獲得專利直到能夠商業化地營運使用，大約花費了 50 年的時間；然而當 1992 年全球革命性的 MP3 音訊資料壓縮格式從研發到進入市場時卻僅花費了 3 年時間，而當時對此科技的研發工作並未因此而告終。

當今的德國研究學者與企業家們一樣必須不斷承受這樣的研發時間壓力，同時國際上的科技競爭也越演越烈。為了讓德國與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人才平頭並進，並使國民能受惠於創新發展，德國教研部推出「群聚（英語：Cluster）」促進攻略。「群聚」在此意味著由不同群例如學術、企業與社會等各界所組成的理想聯網研發區域，其共同目標為對於德國未來影響重大的主題。此策略中需要聰明的頭腦、伶俐機智的研發專家、傑出的大學院校和研究機構、卓越的教育或進修可能，以及具備革新能力的企業。

透過發起此新「未來群聚」計畫將能從過去以來，以群聚與聯網方式所進行的補助方案中獲取經驗，並且以尖端研究案中將首度進入實踐階段的基本結果為導向。藉由此「未來群聚」將產生新一代的前瞻創新區域網絡，而與它們所聯結的將是有遠見的想法以及面對風險的勇氣。這些群聚正將以開放式的創新及冒險文化對此嶄新的合作形式以及現代化的前瞻創新管理工具進行測試。「未來群聚」計畫由此並支持德國政府於「高端科技策略 2025 (Hightech-Strategie 2025)」中強化想法、知識與科技轉移之目標，並對於計畫中的具體任務作出貢獻，致使科技與社會創新知識能夠快速地應用與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中。

在實務上，將可以下列三個現存的群聚和聯網成功案例進一步予以說明：

It's OWL 尖端群聚

「it's OWL」為一尖端群聚「Intelligente Technische Systeme

OstWestfalen-Lippe」之簡稱（中譯：西法倫東區-利佩之智慧科技系統），它目前一共結合了 180 多個不同的合作夥伴進行開發研究：從區域性的大學、世界級機械製造品牌公司，直到麵包烘焙技術的市場龍頭等等。所有的合作夥伴共享一個核心目標：將帕德博恩市（Paderborn）與其鄰近的區域內「智慧科技系統（Intelligent Technical Systems）」競爭市場提升至全球性的頂尖位置。

例如憑藉一個能夠抓取衣服並且予以分類，以及減輕人員工作的前瞻性機器人，它的成果令人感到驚艷，並象徵了該專業界的重要里程碑。

自從 2011 年開始對此尖端群聚提供補助開始，至今已經發展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故事：此地區的企業創造了 8000 個全新的工作崗位、34 家新成立的企業、7 所研究機構和 23 個新科系，在此地區就讀「數、理、自然、科技（MINT）」科目的大學生人數也上升了 48%。

漢堡航空（Hamburg Aviation）尖端群聚

漢堡市屬於全球一個最大且最吸引人的航空工業地點之一，「漢堡航空（Hamburg Aviation）尖端群聚」對於它的塑造與影響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Airbus（空中巴士）、Lufthansa Technik（漢莎科技公司）以及漢堡機場等公司，共同集結週邊 300 多家航空工業供應商以及其他德國北部的機構而形成一尖端群聚。

基於全球航空交通的蓬勃發展，尋求與新興發展市場建立連結並且在此類市場中被視為「卓越中心」對於「漢堡航空尖端群聚」而言至為重要。鑒於德國教研部的「尖端群聚、未來計畫與同類網絡之國際化」方案，「漢堡航空尖端群聚」聚焦於與國際上性能最佳的航空群聚之一的加拿大「Aéro Montreal（蒙特婁航空）群聚」的長期定向的合作。

此外，德國教研部自 2012 年起挹注「研究校園 – 公、私部門創新夥伴」方案以支持位於同一地點的大學、校外研究機構、企業以及其他合作夥伴之間的長期策略夥伴關係，以共同進行應用取向的基礎科學研究。其中「InfectoGnostics（感染·認知）」研究案團隊位於耶拿市的「菲德烈·席勒大學（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之研究校園內，此研究團隊共由 30 個合作夥伴組成並以新式方法鑽研病患感染

的診斷。此由學術界、醫學界、企業界在一個地點共同中研發的治療構想將在稍後由病患進行臨床測試，最後再由參與的公司將其化為產品 – 其中之一，為例如針對感染源和其對抗細菌藥的抗藥性能夠以快速、可靠、非侵入性的方法予以診斷。

每年都有好幾百萬人口由於感染性疾病而喪命，例如因為肺結核或是呼吸道的鏈球菌感染。至今以來的傳統療法通常會浪費太多時間以確定感染的原因，之後方能開始進行治療。「InfectoGnostics (感染·認知)」要設法改變這種情形：研究目的為開發穩定與價格較低的療程與工具，以適用於直接在病床提供診療。此系統應協助可靠與快速地證實病原，以及對治療方式作出更佳的決定；此舉將能明顯地提高病患們的療癒機會。

撰稿人/譯稿人：駐德國教育組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9年8月14日，德國教研部，網頁新聞：「以前瞻群聚網絡迎接德國的未來」

<https://www.bmbf.de/de/cluster4future-so-funktionieren-die-innovationsnetzwerke-9364.html>

美國全國學校董事協會與產業合作，確定六項生涯準備技能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全國學校董事會協會(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NSBA)基於長期關切高中生在畢業後不具職場謀生的基本技能,2019年4月1日該會於賓州費城向來自全國各地的5,000多名學校董事會成員,發佈了由十多個各行業知名團體所聯合倡議的"縮小技能差距委員會報告"(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Close the Skills Gap)。

該報告確定了六項"生涯準備技能"(LifeReady Skills),並提出了建議,主要說明確保學生有學習這些重要技能的機會。該委員會認為,擁有這些生活準備技能的高中畢業生將能為日後大學、事業和生活的工具做好準備。

六項「生涯準備技能」包括：

- 一、可靠性及信賴性(個人技能類別) Dependability and reliability (Personal Skills category)
- 二、適應性/訓練能力(個人技能類別) Adaptability/trainability (Personal Skills category)
- 三、批判性思維(應用知識類別) Critical thinking (Applied Knowledge category)
- 四、制訂決策(工作場所技能類別) Decision-making (Workplace Skills category)
- 五、以客戶為中心(工作場所技能類別) Customer focus (Workplace Skills category)
- 六、團隊合作(人員技能類別) Teamwork (People Skills category)

截至2019年1月職位空缺數量達到730萬個,這是數十年來全國工作職缺的需求首次超過合格的市場勞工,其中只需要高中文憑不需要大學學位的職位空缺數量最多。全國學校董事會協會於是召集了主要商業和工業協會組織的領導階層成立了委員會,雙方通力合作以縮小技能差距(Close the Skills Gap),NSBA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湯瑪斯·根策爾(Thomas J. Gentzel)表示:"學校董事會成員必須處於採取行動地位推動與各行業協會的合作,無論他們做出什麼樣的生活選擇確保所有學生都能獲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委員會中包含了健康管理、旅館與物流、大眾運輸、能源開發、製造業、餐館經營、零售業

等各行各業。

其中美國健康資訊管理協會（America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HIMA）首席執行官 Wylecia Wiggs Harris 表示：健康資訊專業有著很廣泛的職業前景，如果學生在高中期間可以獲得健康資訊管理證書（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HIM）。這將會促使健康資訊管理相關行業的健全成長。

製造業研究所執行主任 Carolyn Lee 表示："報告中概述的 LifeReady 技能與製造商合作的優先事項與他們未來在雇用員工時所尋求的技能屬性密切相關。這些技能為當今學生提供了一個藍圖，讓他們瞭解從學校過渡到職業生涯的需要。他們相信今天採取的重要步驟將有助於解決全國製造商目前面臨的工作力危機"。

譯稿人：蘇惠惠

資料來源：2019年4月1日

<https://www.nsba.org/Perspectives/2019/Linking-LifeReady>

[https://www.nsba.org/-/media/NSBA/File/nsba-report-of-the-commission-to-close-the-skills-gap-](https://www.nsba.org/-/media/NSBA/File/nsba-report-of-the-commission-to-close-the-skills-gap-2019.pdf?la=en&hash=0573C0365E3F5FE7B9ACF9BF374328E62DBB57EE)

[2019.pdf?la=en&hash=0573C0365E3F5FE7B9ACF9BF374328E62DBB57EE](https://www.nsba.org/-/media/NSBA/File/nsba-report-of-the-commission-to-close-the-skills-gap-2019.pdf?la=en&hash=0573C0365E3F5FE7B9ACF9BF374328E62DBB57EE)

<https://www.nsba.org/News/2019/Skills-Gap-Commission-Report>

學校營養午餐效果，日本兒童過重比例為先進國最低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於 10 月 15 日公開以孩童營養狀態為主題的「世界兒童白皮書 2019」特集。內容指出日本孩童身高體重比呈「過重」之比例為 14.42%，是先進國家中最低之國家。UNICEF 認為在日本學校營養午餐普及是非常重要的要因。

「世界兒童白皮書 2019」指出，世界上有 4000 萬孩童有過重或肥胖問題。根據彙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歐盟(EU)會員國 41 個國家 2016 年時的 5~19 歲過重比例之結果顯示，美國為 41.86%居首，且除日本外的所有國家皆超過 20%。與 1990 年相比，除比利時外所有國家皆呈上升。

白皮書也指出經濟不寬裕家庭的孩童與過重有著關連。示警不均衡的飲食生活及家庭經濟環境的影響，會讓孩童陷於過重的風險中，呼籲各國採取對策的重要性。

UNICEF 總部營養部門的 Roland Kupka 首席顧問表示，日本可以將過重比例控制得比其他國家低是因為學校營養午餐制度所帶來的效果，並說「全國性供餐制度提供孩童營養均衡且廉價的飲食，並讓孩童藉此學習營養知識。也有可透過該制度維持傳統飲食習慣之優點」。

資料來源：2019 年 10 月 15 日，教育新聞

https://www.kyobun.co.jp/news/20191015_02/

陪審團判定愛荷華州立大學對學生的 自殺負有部分責任，這對其他大學有何啟發？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上個月，陪審團判定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在2015年21歲大3生丹·舒斯勒（Dane Schussler）自殺案中負有部分責任，並須賠償家屬315,000美元。

論者表示，這個案件引發的疑問是，大學到底對於學生的身心健康負有多大的責任；學術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如果縮減了，又會招致什麼法律責任；某些常見的治療方式是否有檢討的必要。可以確定的是，舒斯勒所接受的治療及死亡原因相當複雜，而且就像每一件自殺案一樣，令人非常難過。舒斯勒的朋友及家人說他是一位機穎、風趣的年輕人，有著大好的未來。

以下是此事件幾個特別受到法律及醫療學者關注的面向：

舒斯勒的治療師是一位研究生助理，擁有碩士學位，但不是持有執照的心理學家。監督她的主管也沒有執照。諮商中心有執照的心理師沒有觀看舒斯勒的療程錄影，也沒有直接參與治療或要求與他的家長聯絡。（大學反駁，治療師及兩位主管已可組成一個符合資歷的團隊。）

諮商中心的前任主任作證指出，預算縮減導致人手短缺，2011及2012年皆提出警告，預示可能的後果，包括自殺案件。

專家證詞顯示，舒斯勒已談及自殺念頭，但治療師誤將嚴重的憂鬱症診斷為輕微憂鬱症。

除了提供一些應對策略及自殺防治熱線的號碼外，舒斯勒的治療師要求他簽署一份「合約」，承諾不會傷害自己。治療師表示，這份合約讓她感到安心，以為舒斯勒不會自殘。

校方正考慮是否上訴，學校表示，這份判決不符該州最高法院先前所做出的裁判。在先前的案件中，法院「認為大學生的情況和病患住院或在醫院環境中接受治療不一樣，大學不對學生負有事實監護責任，因此大學無法防止學生自殺。」

東北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麥德威（Daniel S. Medwed）表示，理想上，諮商中心應該向有各式各樣需求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個別提供合適的治療方式。也許對某位學生來說，六次療程就已經足夠；而如

果諮商中心時常大驚小怪，那可能對於學生尋求協助有遏阻的效果，「有時學生只是想要有可以安心暢談的地方。」

麥德威指出，隱私法的寬嚴也必須妥善拿捏。如果過於嚴厲，那家人應該參與治療討論時可能會被排除在外；而如果過於寬鬆，學生可能不敢來諮商中心討論問題。

麥德威表示，可以確定的是，大型公立學校諮商中心的職員捉襟見肘，會帶來醫療及法律上的隱憂。除了學校外，各州的議會都應該審慎思考資源配置的先後次序，也都應該負起責任。

紐約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副教授及傑德基金會首席醫療官維克多·史瓦茲（Victor Schwartz）表示，如果大學承諾要治療臨床病症，那就必須聘僱擁有執照、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來承接這份工作。如果大學沒有資源，就不該做出這樣的承諾。

休士頓大學的法學教授及高等教育專家麥可·奧利瓦斯（Michael A. Olivas）表示，諮商中心以6次療程來打發明顯透露出警訊的個案，這樣的做法問題重重。傑德基金會的史瓦茲指出，為療程設定上限是常見的做法。不過在接觸個案的一開始就決定療程次數，而且即便種種跡象顯示個案病情嚴重仍維持原先的設定，這才是問題所在。

麥德威和奧利瓦斯也認為治療師要求舒斯勒簽署的「合約」十分令人不解。他們了解這是療程的一部分，不過麥德威指出，這種做法本質上具有強迫性，就像是「定型化契約」，學生必須簽署才能換取他所需要的協助。簽署了這樣的契約，假如個案搬上法庭，也會使陪審員想到諮商服務答允卻不一定達成的承諾。

這樣的合約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但如果能有醫療效果，那就另當別論，不過史瓦茲指出：「沒有證據顯示這樣的合約有任何效果，其實甚至可能有反效果」，讓治療師誤以為可以放心，「這種方法並沒有事實根據。」

史泰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高等教育法律中心主任彼得·賴克（Peter F. Lake）表示，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案子及2018年麻州針對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判決顯示，法界對於自殺正逐漸改觀。賴克指出，數十年來，除了少數例外，比方說因濫用法律程序或誤用藥物而導致的自殺，否則法界從不認為這是機構的責任。主流觀點是，儘管提供合理的照護，仍無法防止所有自殺。

不過賴克指出，這樣的想法也許正在改變。陪審團似乎特別在意服務不足或遭到縮減的案子。賴克表示：「當今的人們比以往需要更

多服務，如果機構要裁撤服務，最好三思後而行。」

寬裕的大學能比支絀的大學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服務，因此資源不均也開始顯現在心理健康方面。

丹·舒斯勒的母親凱瑟琳·舒斯勒（Kathryn Schussler）表示，不論大學的資源多麼充沛，在教育學生方面，校方可以做得更多。她說，學校都會要求學生觀看影片，讓他們瞭解酗酒及性侵的負面影響，那他們也可以讓學生觀看心理疾病及相關警訊的相關影片。

她也說，聯邦法律阻礙大學與家長溝通學生的困境，不論是危機當下或甚至是自殺之後，而這一點需要盡快改革。凱瑟琳·舒斯勒表示：「體制失靈了，大學無法獨力處理自殺的問題，我認為學校應該讓家長參與。」她說，以她兒子為例，丹大概需要請病假。

大學所提供的服務當然有個限度，但校方應該要坦誠面對其極限。如果大學無法與家長溝通，如果校方無法提供適當的密集性介入，那他們應該讓學生及家長知曉這一點。「讓家長知道自已的小孩到什麼樣的地方就學，誠實面對家屬。」

凱瑟琳·舒斯勒在一篇專欄中寫道：「難怪大學的自殺率高升……大學大力行銷自己會『照顧學生』，可是一旦出了岔錯，校方又不負任何責任，因為他們和學生之間沒有『特殊關係』。學校政策是，假如學生表達出自殺的念頭，不可以通知家長；學生自殺未遂，還是不能通知家長。校方來電時，是通知我們來認領死去孩子的屍體，然後掩蓋死因的一切細節。」

撰稿人/譯稿人：Alexander C. Kafka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9.4). "A Jury Found Iowa State U.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a Student's Suicide. Here's What That Could Mean for Other Colleg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Jury-Found-Iowa-State-U/247075>

聯邦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率急遽升高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在過去 10 年中，青少年自殺率急劇上升，在 2007 年至 2017 年間，介於 15 至 19 歲年齡層的青少年的自殺率增加了 76%，而同一時期內 10 至 14 歲青少年的自殺率幾乎增加了兩倍。

相較於上一時期（2000 年至 2007 年），這是一次急劇的翻轉，當時 15 至 19 歲的自殺率一直保持穩定，而 10 至 14 歲的自殺率甚至有所下降。

雖然自殺仍然相對稀少，但現在已成為 10 至 19 歲人口中第二大死亡原因。事故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兇殺則排在第三位。

沙加緬度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兼學校心理學課程協調專員史蒂芬表示，單一自殺事件的後果可能會對朋友，家人和同學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以五年為基準，在美國中等規模的高中，自殺死亡不會超過一個。但具爭議的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更大的問題不是預防自殺，而是輔導自殺者留下來的遺族。

自殺率上升是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的一個警鐘。曾任美國學校心理學家協會主席的布魯克表示，並不是精神疾病大幅度增加，而是精神疾病的類型和嚴重程度有所上升，特別是我們看到了因憂鬱而需要住院的女孩人數顯著增加。而死於自殺的人中，9 成患有精神疾病。

學校經常在資源和專業知識有限的情況下掙扎，無法滿足如今青少年所面臨的廣泛的心理健康需求。專家們認為，老師、校長、教練和其他學校工作人員在預防自殺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透過認識那些可能會傷害自己的高危學生，將這些學生與資源和支持聯繫起來，並在整個學校中建立連結，學生需要幫助時可以向多人尋求協助。

目前尚不清楚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增加的原因，但研究人員正在探索多種解釋，包括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的使用以及霸凌的盛行。

撰稿人/譯稿人：鍾慧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17日，Education Week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ulesforengagement/2019/10/teen_suicides_rising_sharply_federal_data_show.html



當學校變成跨性別學生的戰場，老師要學習保護他們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隨著開學季的到來，未來的主人翁們邁向返校的路途，成群結隊的男女學生分成兩路，報到的名冊上也早已標註著學生的姓名以及性別。

學校對於性別尚未確定的跨性別學生而言，往往是帶來許多不便的地方，不只有甚至引起訴訟的跨性別學生廁所使用權，還有更多潛在的問題值得討論。跨性別權益的支持者認為，學校教師必須提供跨性別或是性別尚未確定的學生安全、支持、並且有包容性的教學環境，這些學生的性別取向並不一定和出生時傳統思維的期望相同，因此教師們特別需要專業的訓練。美國幼童性別教育平等計畫主持人 Sophia Arredondo 表示：「教育者們非常需要在這方面的指導與訓練，大部分教育者期望自身不要有任何閃失，他們也希望能夠提供幫助。儘管如此，我們都知道教育者們的專業訓練中時常缺乏 LGBTQ 性別多樣化身分識別的訓練，更不用說針對跨性別、或性別未定的認知。」

研究顯示，跨性別的學生比起其他非跨性別的學生，更傾向逃學、成績表現不佳、或視學校為不友善的環境。美國幼童性別教育平等計畫在 2017 年的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四的跨性別學生和百分之七十性別未定的學生在學校曾被霸凌或騷擾，其中也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學生被學校禁止使用他們自我認同的名稱或稱謂，將近一半的學生被強迫使用與他們自我身分認定不同之性別的廁所。對此 Sopiha Arredondo 指出：「教師及行政人員的幫助與支持可以改善這些困境，當學生感到不被認同、或是感到不安，他們是沒有辦法學習的。」

目前並沒有可信的資料顯示將自己認定為跨性別或是性別未定的學生的數量，不過一項針對 81,000 位明尼蘇達州青少年的研究指出，有將近百分之三學生的自我性別認同為跨性別或性別未定，這些受調查學生當時為八年級和十一年級。

為教育者做準備

然而，當今大部分的職業訓練機構與師資培育並無法示範這些教師如何與這些不同性別認同的學生相處。五年前，科羅拉多大學教育

的學院正視這個問題，他們培育出來合格的教師非常缺乏教導不同性別認同學生的經驗。「酷兒的奮鬥(A Queer Endeavor)」這項計畫便是致力於提供師資專業訓練、並提供教師與不同性別取向的學生相處的機會，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同時也是「酷兒的奮鬥」共同主持人 Bethy Leonardi 說道：「以某方面來說我們虧欠於這些學生。我們認知到這個需求，在這個領域的教師們也非常渴望得到這方面的訓練與支持。」自 2004 年以來「酷兒的奮鬥」已經訓練的超過六千位師資人員，其中包含老師、諮詢師、以及行政人員，組織與科羅拉多政府合作，不只舉辦橫跨整州一年一度的職業訓練機構，還提供任何有需要的師資專業訓練。Bethy Leonardi 表示：「我們對於這些不同自我性別認定的學生經常討論到『我們該怎麼保護他們？』我們的計畫著實拓寬此類談話的含意與真諦，我們的目標是創造這個文化，讓學生感到他們的性別多樣性是得到認可的。我們常告訴學生『把與師長分享你自我認定的稱謂當作是你們談話的開場白』讓這些行為同時也成為學生課堂上的教材。」她也提到，老師們可以從在課堂中挑戰一般對性別的既有印象、避免如「男生、女生」的性別用語，同時也鼓勵教師們在教室中規畫讓學生分享自我認定之稱謂的空間。

麻州鹿野學院的高中物理機械老師 Megan Hayes-Golding 說道，她常在課堂中分享自己個人情感，同理也因此變向鼓勵學生向自己吐露真實情感。舉例來說，她會在對話中提及她的太太、包括她的稱謂以及名牌上的稱號，她也總是告訴學生可以與她分享他們自我認定的稱謂，但這些並不是強制的，「如果我要求每個學生都在課堂中分享他們的稱謂，那些剛思索出自我稱謂的學生將會感到不自在。」

另一方面，印第安那州銀灣高中十年級與十一年級的英語老師 Erin Braune 表示，該學校中有數名跨性別或性別未定的學生，Erin Braune 同時也是該校「同性戀異性戀同盟」的發起人，「當他們告訴師長他們自我認定的身分時，他們感受到被尊重與支持。」不過仍非所有學生都會分享此資訊。為了因應這個狀況，Erin Braune 特別使用返校調查的機會，藉此詢問學生他們自我認定的稱謂，舉例而言，有些學生只希望她私下用他們認可的稱謂稱呼他們，而非在當眾在班上其他同學面前如此稱呼；而有些學生可能則希望在外被如此稱呼，而非對於他們的家長，學生「需要一個讓他們可以暫時卸下心防、隨心所欲發問各種問題的地方，這幫助他們衡量別人眼中的看法。專家表示，這項計畫可以從各個年級開始，事實上，Leonardi 也說通常最多

小學教師自願登記接受「酷兒的奮鬥」的訓練。

羅徹斯特理工學院諮商中心的助理主持人 Christopher Henry Hinesley 也是致力於幫助剛進大學、不同性別取向的學生，他也發現學生開始適應環境的過渡期提早，「我看到越來越多學生已經在來到這個學校前，最少在社交方面就已經經歷完過渡期，有些甚至已經完全準備好了。我知道有一大批學生應該在初中或小學就已經度過完整的過渡期。」Hinesley 指出，這也代表任何年級的老師都需要具備與不同性別取向學生相處的能力與課堂的教材。不過近幾年來，只有伊利諾州、加州、紐澤西、和科羅拉多這四個州強制融入不同性別取向族群 LGBTQ 的發展歷史。「只有表面功夫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關心討論更多他們當今的待遇，很多人遇到填表時，他們寫下的身分認同會被刪除，這樣我們要怎麼說服人說我們的包容性已經更高了？」

學習專業語言

Leonardi 指出，這就是教師專業訓練如此關鍵的原因，「酷兒的奮鬥」的訓練使教師們能夠具備與不同性別取向 LGBTQ 學生溝通的方式和語言，「很多教師不知道該怎麼使用這些語言，舉例來說，這會使他們讓這些學生感到不夠被支持、或是覺得他們不夠認識生理性別和性別取向的不同，不過這不是老師本身的問題，因為這個現象一直被視為不洽當或是有爭議的。不過其實，這一點都沒有爭議性，因為這關係到學生存在的價值。」Braune 也說，印第安那州銀灣高中的教師們非常渴望支持不同性別取向的 LGBTQ 學生，不過他們不知道從何關心起、或從何幫助起，因此她向這些教師宣導使用詞彙像是「尚未決定性別」和「性別非二元性」，讓這個教職人員可以在過程中感到更有自信。此外，Braune 提到，現在該校的「同性戀異性戀同盟」已經是由學生主導，他們也幫這些教師們上了重要的一課。

上個學期，明尼蘇達州霍普金斯學區舉辦跨性別學生的訓練活動，由 3 位跨性別學生主持分享。該區木柵小學公開同性戀取向的校長 Mark French 也參與這項活動，他表示他自認為是掌握原則建立了具有包容性的校園環境，不過能夠直接聽見來自跨性別學生的分享，特別有說服力，「我從這些學生學習到，我們必須要尊重他們對於自己身分的認同、以及他們想要怎麼被他人認識。」

撰稿人/譯稿人：陳俊瑋

資料來源：2019年9月16日，Education week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9/18/when-schools-a-battleground-for-transgender-kids.html>



英國政府平等辦公室公布性別平等路徑圖，以保障女性權益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今年7月初，英國婦女與平等權益大臣（Minister for Women and Equalities），Penny Mordaunt 女士宣布英國政府推出性別平等路徑圖（Gender equality at every stage: A roadmap for change）（以下簡稱「性平路徑圖」），宣示政府將從生活、求學、就業以及社會福利等各方面，提升並保障婦女權益。

此份性平路徑圖報告不僅揭示英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的推動方向與規劃，也揭露英國社會在各個層面所存在的性別歧視與性別議題，以及可能造成的原因。

透過相關數據顯示，性別不平等在幼童時期已經存在。從不同年齡層的光譜來看，在7歲至11歲孩童之中，男生表達將來要當科學家的數量較女生多出兩倍；約有57%的女生認為女生較男生較會做家事。在青少年18歲至21歲區間，女生在英國普通中學會考（GCSE）的STEM科目（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等四個學科的代稱），普遍表現優於男生；但是進入A-Level課程後，選修數學的男生人數較女生多出兩倍、選修物理的男生人數是女生的四倍、選修電腦科學的男生人數更是女生的八倍之多。在22歲至29歲區間，投入英國勞動市場的女性普遍較男性擁有較高的學歷與專業資格，但獲得的起薪待遇卻低於男性，且多數女性是從事秘書或助理等較低階的職務。30歲至39歲年齡層的女性，是感受男女薪資待遇不平等最深刻的時間點，尤其是擁有小孩的職業女性，其薪資普遍較男性少了三分之一。年齡在40歲至55歲的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人數較男性超出三倍以上，且較少有升遷的機會；此年齡層的女性也較男性更容易面臨到需要挑起照護家人與處理家務的需要。而在55歲至64歲區間的女性，因為工作職缺、薪資待遇以及升遷機會等因素，個人退休金的金額也較男性短少近20%。

從個人的發展時間軸而言，英國女性因為發展機會少、賺得少且存得少，較男性更容易陷入財務不健全的困境。為了確保政府政策推動可以對症下藥，性平路徑圖報告進一步分析八點可能造成性別不平等的原因。

第一、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不僅限制女性的學習發展和生

涯選擇，也是部分造成女性遭受暴力對待或性騷擾的原因。第二、勞動市場普遍提供女性屬於庶務型或位階較低的職缺，主管級職缺仍以男性為主。例如英國中學教師雖然有 63% 是女性，但中學校長中只有 38% 是女性。第三、英國政府所提供的工作福利政策，因為執行單位分屬 3 個組織、6 個工作小組，過於複雜的組織架構使得有需要政府支援照護服務的家庭或個人，無法適時獲得支援。第四、小孩照護責任使女性無法在職場上獲得充分發揮，也容易錯失工作升遷機會，是造成男女薪資差異的關鍵因素。第五、女性的照護責任不僅是照顧幼成年兒童，也包含成年人的照護，整體上約有四分之一女性需要負擔照護責任，而男性整體上只有八分之一會需要負擔照護責任。第六、部分女性在進入或返回勞動市場時，會遭到阻礙。第七、由於職涯選擇以及薪資待遇的因素，女性往往較容易面臨財務不穩定。第八、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霸凌以及既定的性別框架，容易使女性面臨暴力對待的處遇。

為了全面地保障婦女權益，英國政府根據上開原因提出八項相應的施政項目。第一、扭轉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角色分工與期待，確保每位女性都能自由展現天賦、選擇想發揮的領域以及工作。第二、與民間合作改善男女薪資落差，鼓勵同工同酬且給予有能力的女性公平的升遷機會。第三、政府的工作福利制度要以使用者友善的角度進行調整，簡化申請手續、優化作業程序，並使資訊有效傳遞給需要的家庭與個人。第四、鼓勵男女共同分擔家務與照護責任，扭轉社會上以女性為核心的照護觀點，改以共同承擔和分工的角度分配勞務、家務。第五、鼓勵公私部門給予女性平等的就業條件與職場環境，且提供充足照護人員與資源，分擔女性的照護責任，使女性能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第六、協助女性返回職場。第七、健全女性財務狀況，包括女性的退職與退休待遇、協助離婚女性能享有伴侶的退職與退休金待遇。第八、相關的政策調整以及經費規劃。

英國平等辦公室（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提出的性別平等路徑圖深獲民間支持。身為慈善管理機構主席的 Ann Francke 女士，即讚賞政府此份路徑圖是具有抱負、全面且完整的施政報告。雖然性別議題極為複雜且短期內不易攻克，但政府若能與民間合作，配合具效率與魄力的行政效率，她相信性別平等將不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Mordaunt 大臣也承諾此性平路徑圖只是開端，而不是結束。政府會投入相關資源並配合政策的調整，確保女性從出生到退休，都能

享有平等的待遇與權益。

資料來源：

2019年7月3日，Gov. UK,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Press release, ‘Penny Mordaunt sets out plan to empower UK wome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enny-mordaunt-sets-out-plan-to-empower-uk-women>。

2019年7月3日，Gov. UK,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Policy paper, ‘Gender equality at every stage: a roadmap for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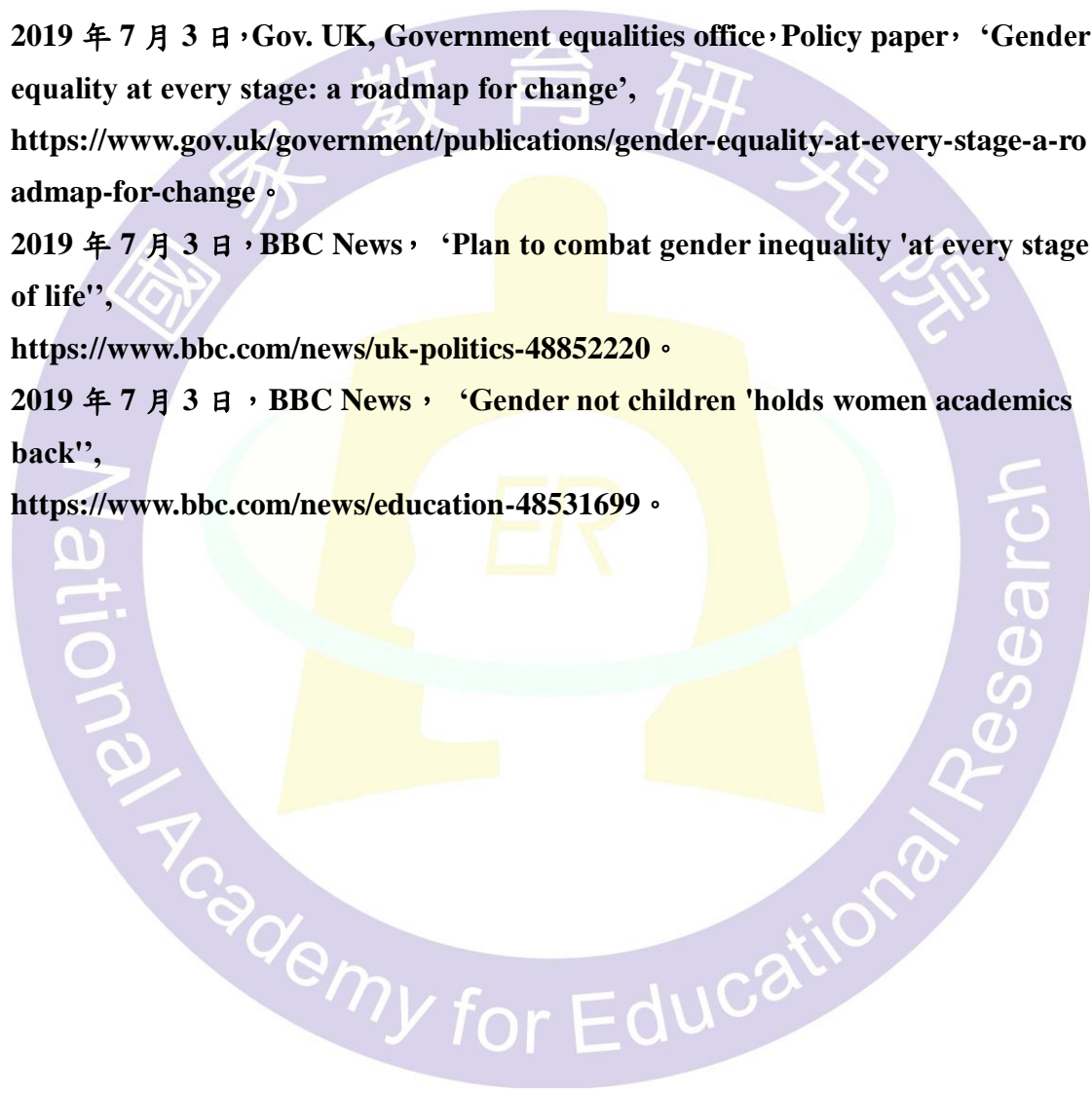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ender-equality-at-every-stage-a-roadmap-for-change>。

2019年7月3日，BBC News, ‘Plan to combat gender inequality 'at every stage of life’,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8852220>。

2019年7月3日，BBC News, ‘Gender not children 'holds women academics back’,

<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48531699>。



瑞典教育部長談大學推動性別主流化重要性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瑞典政府是女權主義政府註 1，將性別平等置於全國和國際工作內容中。性別主流化結合特定性別平等措施以實現性別平等政策目標是政府著重的策略。瑞典高等教育暨研究部部長葉可蘭 (Ms. Matilda Ernkrans) 偕同「瑞典性別平等署」(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註 2 署長 Ms. Lena Ag 於月初會晤瑞典全國各大學校長，聽取各校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推動成效。

瑞典中央政府為推動全國性別平等主流化，於 2018 年成立「瑞典性別平等署」。性別主流化意味著在影響人們狀況的所有政策在決策前都應從性別觀點來考慮資源分配並建立規範，以促進男女性都能過上平等的生活。將性別平等納入主流策略是性平政策中最優先考慮的事項之一。政府透過各部會及機構推動並強化性別主流化，擬定 4 年(2016-2020)推動中央行政部會性別主流化工作，涵蓋 33 所大學，共 60 幾個公務機構。

教育部針對大學性別主流化推出 3 年(2016 年至 2019 年)專案計畫要求各大學提出各校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依計畫推動落實校內性平工作葉可蘭部長在決定是否延長該專案計畫前，和大學校長會晤以聽取各方意見。

她說：「全國 1/4 公務人員在大學任職，所以大學把推動性平主流化當成工作重點項目是非常重要的。這項工作不僅影響多數職員，更影響成千上萬名學生。」

大學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主要著重在個體公義，但也是社會發展的關鍵。

瑞典性別平等署署長 Ms. Lena Ag 及調查委員 Ms. Ida-Maria Linder 也提出一份瑞典全國大學性別主流化工作進度報告，同時聽取各校對未來計畫的看法。

這次報告主要項目為：對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投入、大學推動的重點、大學目前推動及實施成果、瑞典性別平等署的結論。

全國 33 所大學均對性別主流化提出計畫，而且大多數都已開始著手執行計畫內容。

根據教育部，有兩所執行成果優良的大學：首先是皇家理工學院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校長 Prof. Sigbritt Karlsson 提到 KTH 持續深耕提昇性平意識的工作，此外也投入相關培訓，讓各層級主管能藉由發展相關素養了解自身責任並採取行動以促進性別平等及其價值觀。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學(Kristianstad University)副校長 Prof. Anna-Karin Edberg 則談到大學內部分配研究經費的新架構。該大學將性別主流化的工作融合研究資源平均分配的工作裡，藉由從性別平等角度透過整合工作計畫重新審查分配機制並建立新的分配模式。現今模式是結合的每個研究人員在同一研究期限內對自己研究所投注的時間與成果進行比較，同時也將協作部分納入考量。因大部分研究人員是女性，這就成為女性研究人員額外的績效成果，調整後的研究經費分配模式對女性研究人員較為有利。

依據教育部另性別平等工作計畫截至目前為止的成效如下：來自各大學的人員進行分組討論，討論大學未來性別主流化工作該如何持續下去。各校也提出對政府進行下一步計畫的建議。除了點出政府對性別主流化持續支持的重要性外，並建議政府繼續賦予大學性別主流化的任務。藉由各大學年度報告提報成果並和各部會持續不斷地對話來進行追蹤。葉可蘭部長強調政府對大學目前所做的性平工作高度重視。

最後部長以「性別平等工作對我及對女權主義政府（the feminist government）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很高興許多人對繼續推動性別主流化達到共識」做結。

註 1:

<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19/03/a-feminist-government/>

註 2: 「瑞典性別平等署」主要工作任務是通過促進有效執行性別平等政策以確保落實政府的性別平等主流化各項重點政策。瑞典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的目標是希望男性和女性均擁有塑造社會和自己個人生活的相同影響力和機會，包括對社會的影響力及對個人財務、健康、教育、工作及自我發展等的平等機會。基本上，性別平等工作目標即是為了實現性別平等而重新分配權力及資源。

撰稿人/譯稿人：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鍾菊芳

資料來源：

Swede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9, 10,15). "Arbetet med

jämställdhetsintegrering i högskolan.”

<https://www.regeringen.se/artiklar/2019/10/arbetet-med-jamstalldhetsintegrering-i-hogskolan/>

Sweden, Ministry of Employment (2019, 3, 7). “Jämställdhetsintegrering”

<https://www.regeringen.se/regeringens-politik/jamstalldhet/jamstalldhetsintegrering/>



招生歧視案哈佛勝訴 常春藤盟校讚：重申多元化益處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亞裔告哈佛大學招生歧視案備受關注，由於此案涉及大學招生平權政策，各大學在庭審後一直在焦急等待裁決。波士頓聯邦法院法官柏若斯(Allison Burroughs)1日裁定哈佛未違憲，包括多所常春藤盟校在內的高校高層表示讚賞，稱此裁決確定可繼續將族裔作為招生考量因素之一；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FFA)已表示會上訴。

據波士頓環球報報導，布朗大學發言人克拉克(Brian Clark)稱，法官柏若斯這一決定「重申了多元化學生構成對整體學生群體帶來教育益處」；如其他高校一樣，布朗大學計畫對這長達130頁建議仔細審閱，以了解對該校的錄取做法有何具體影響。他說，「目前而言，我們理解到，這一裁決保留了種族可作為我們錄取過程中眾多因素之一的權利」。

普林斯頓大學發言人 Ben Chang 說，「支持哈佛大學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和族裔的立場」；該校認為，多元化學生群體「對我們的教育使命至關重要」。

耶魯大學高層也對法官裁決表示讚賞；發言人 Karen Peart 說，此決定重申聯邦法院認定「大學可將種族和族裔作為招生審查程序一部分，及可自多元化學生群體中獲得至關重要的教育收益」。

喬治華盛頓大學前校長 Stephen Joel Trachtenberg 說，如果哈佛敗訴，會是全美高等教育的壞消息；他說，多元化招生政策不僅是將拼圖拼到一起，遠比直接招收錄取分數最高的學生要複雜的多。

新英格蘭地區多所高校也肯定若斯的裁決；緬因的 Colby College 招生辦公室主任 Matt Proto 說，種族因素是該校一直關注的事；該校採取「整體錄取程序」，包括個人背景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希望招收來自不同背景的最有才華的學生。

西蒙斯大學校長 Helen Drinan 也表示支持裁決和哈佛的招生程序；她說，平權政策應繼續獲得很多美國大學和學院的支持，該政策與大學的多元化價值使命一致。

Amherst College 校長 Bidy Martin 說，裁決重申了種族因素招生的重要性和合法性，這是高校整體審核申請人的一部分；他說，「社會的福祉取決於人才的識別與發展」。

譯稿人：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3日，世界日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541762/article-%E6%8B%9B%E7%94%9F%E6%AD%A7%E8%A6%96%E6%A1%88%E5%93%88%E4%BD%9B%E5%8B%9D%E8%A8%B4-%E5%B8%B8%E6%98%A5%E8%97%A4%E7%9B%9F%E6%A0%A1%E8%AE%9A%EF%BC%9A%E9%87%8D%E7%94%B3%E5%A4%9A%E5%85%83%E5%8C%96%E7%9B%8A/>



加國媒體素養週推廣事實查證，並遏止假信息的傳播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MediaSmarts 和加拿大教師聯合會（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簡稱 CTF）於本（10）月 7 日啟動「媒體素養週」（Media Literacy Week，10/7-10/11）。全國各地的師生，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社區團體都在開展活動，鼓勵加拿大人「終結假消息」（Break the Fake），在分享信息之前，請先查清楚他們在網路上所看到的訊息。

MediaSmarts 執行董事 Kathryn Ann Hill 表示，當今網路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錯誤訊息的傳播。她希望能藉媒體素養週來提醒加拿大人，在分享任何網路內容之前，先查證故事或社交媒體貼文的真實性及準確性。

加拿大教師聯合會（CTF）主席 Shelley Morse 表示，隨著學生在聯繫越來越緊密的網路世界中成長，他們所需具備判斷網路消息真實性的能力及工具也越來越重要。媒體素養週重點在能識別錯誤網路訊息及阻止其繼續擴散所需之警覺及集體責任。

今年的「媒體素養週」以「終結假消息」和 House Hippo 為公眾意識主導。受歡迎的 House Hippo 虛擬河馬出現於 1999 年的電視公益廣告，旨在教孩子應抱持批判及創造思維，認真思考在電視螢幕上看到的內容，此訴求仍不斷在當今各年齡階層的人們中引起共鳴。

加拿大人還可以使用 Break the Fake 網站的免費資源，包括研討會、小提示、海報及宣導短片。在「媒體素養週」及往後的課程中，也有提供老師使用的課程安排。

媒體素養週是 MediaSmarts 及 CTF 共同舉辦的年度盛事，旨在提高網路和媒體素養。通過組織活動、研討會及加拿大政府的推廣，全國有 100 多個組織參加今年的媒體素養週。

「媒體素養週」得到 Telus、Facebook、Bell、Twitter、YouTube、紐芬蘭與拉布拉多教師協會、安省英語天主教教師協會、安省小學教師聯合會及新斯科細亞省教師工會等機關組織的支持。

撰稿人/譯稿人：林宥嫻

資料來源：2019年10月7日，Break the Fake.ca，「Break the Fake: Media Literacy Week starts today, promoting fact-checking and stopping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MediaSmarts

<http://mediasmarts.ca/press-centre/press-releases/%E2%80%9Cbreak-fake%E2%80%9D-media-literacy-week-starts-today-promoting-fact-checking-stopping-spread-misinformation>

